

2021年
第3期

总第4期



IIAS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田野观察

清华地区研究学人的田野故事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IAS 清华大学 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目录

引 言	I
刘岚雨 战争的距离	1
高良敏 同一屋檐下的租客 ——我在坦桑尼亚的女同事	9
袁梦琪 阿根廷的马黛茶文化	22
齐腾飞 一条铁路，一个国家 ——肯尼亚铁路与殖民旧事	33
汪可可 中国女孩在聂鲁达诗社的日子 ——中智诗歌交流的桥梁	44
谢维宁 偏见与傲慢 ——哈萨克斯坦抗疫实录	55
姚 颖 在仰光大学教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66
杨 光 漂泊的“胃”：作为成都与特拉维夫两地的异乡人	77
唐溪源 在想象与现实之间 ——记一次加蓬投资调研之旅	84
王霆懿 宗教王国：沙特的礼拜与斋月	95
石 靖 行走库拉河：高加索的山水时空	102
科里亚 哈国警察故事	111
唐永艳 “再造”的古巴美食和古巴厨房里的“美食家”（上）	125
傅聪聪 来自东南亚的海南鸡饭： 美食中的族群互动、再生产与全球化（上）	135

引言

清华大学地区研究学人足行全球南方已近十载。“田野”的磨砺推进着自我的成长和对他者认知的历程；同时，自我与他者也共同参与、共同见证着学人的成长。对于地区研究学人而言，“田野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工作程序”，更是一个生活上、情感上的“修行”，历史镜像、客观事实、主观意志等等并行其中，相互渗入、相互形塑。

简单而言，我们长期的田野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强烈的文化冲击、不适感、逐步适应等一系列生活化的洗礼。在这一过程中，他者与我们相互嵌入对方的生活、学习、研究之中，相互活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自我外部世界他者的认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往往受制于“西方因素”或自我臆想的建构，尽管这种困扰不可避免，也并非不“真实”，但它确实是一个萦绕于田野的幽灵，影响着我们对于“他者”的认知。同样，在学理上，各个学科、各个学者对“他者”都有着不同理解和定义。

那么，研究者自身所拥有的背景知识、研究视角以及价值取向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所谓“他者”的客观真实的？当我们以研究者的身份自居时，是否就已经预判了田野工作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庄子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无论在进入田野前研读过多少对象国文本，在语言上进行过多少准备，我们又是否能在田野工作中真正捕捉和论证“他者”的真实？汇聚众多学科对于“他者”的反思以解开上述种种迷思，才能为我们理解自身的田野经历提供更多的帮助。

在田野中，我们会遭遇或者邂逅形形色色的图景和元素：人——我们的老师、朋友、同事、同学、访谈对象、房东、警察等。事——喜怒哀乐之事、七情六欲之事、芝麻般的生活琐事等。物——食物、礼物、交通工具、文化之物或意义之物；动物——鸟、狗、猫、猪、牛、羊、鱼等。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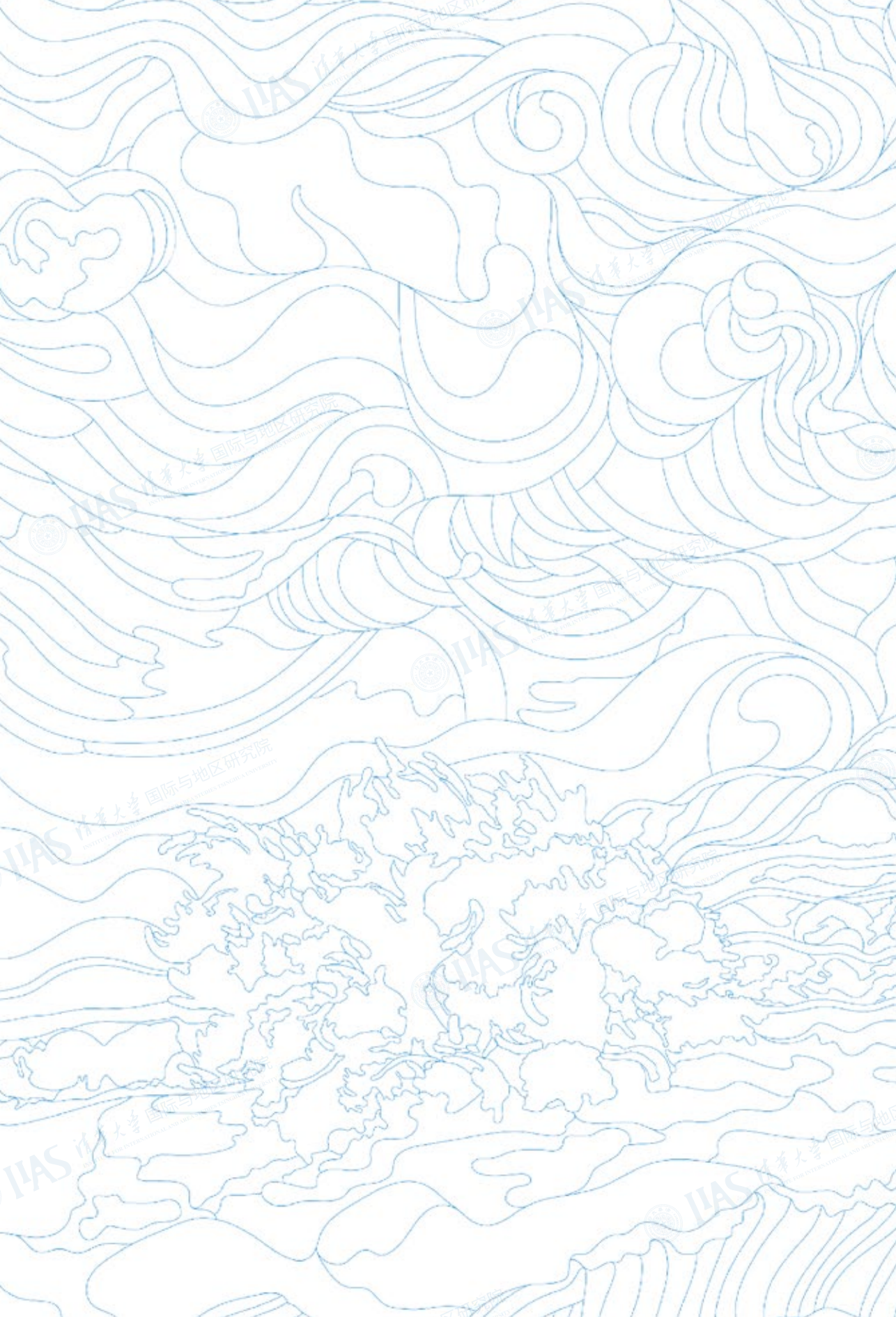
城市、农村、社区、学校、研究所、医院、警察局、移民局、图书馆，甚至卫生间、厨房等生活空间等。情感——特殊的社交礼仪场景，令人感动、令人深思或有特殊意义的情感场景或空间等。自我——了解他者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自我，甚至发现自我、批判自我的过程。换言之，田野之“他者”，不再抽象、神秘或充斥着臆想，而是真实、可触摸及灵动之“他者”，其真实的另外一面也在于回望自我。

在田野中，我们还会经历步步深入的认知转变与学术成长：起初，我们懵懂、模糊，带着想象，甚至是臆想，它们困扰着我们对于研究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而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田野工作后，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拥有微观或日常生活层面的细腻感触，乃至宏观层面的整体把握，从而使得我们对“他者”的认知逐步清晰化，对他国的理解、自我的了解也进一步提高，甚至可能推动对既有学理研究的反思和批判。

基于此，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成立《田野观察》编辑部，组织院里有长期发展中国家田野调研经历、发达国家访问学习经历的研究员、博士生及部分优秀的外院外校地区研究人员来共同讲述我们的田野故事，以供地区研究学人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感兴趣的大众阅读。从地区研究学人的视角出发，以一种夹叙夹议、有温度的方式，再现田野生活的各色图景，思考“他者”与“我自”的关系，进而彰显田野调研与地区研究之间的张力，重塑其重要性并探讨其意义之可能。编辑部拟推出《田野观察》系列，呈现真实、鲜活的田野故事。第一期（2020年12月）16篇、第二期（2021年3月）14篇、第三期（2021年6月）11篇已刊印成册，第四期（2021年9月）14篇稿件亦于2021年8-9月在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微信公众账号《田野观察》栏目完成推送。

《田野观察》编辑部

2021年9月1日



战争的距离

刘岚雨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伊朗

一、停电与空袭

去年5月中旬某日的晚8点左右，我所居住的德黑兰米尔达马德的东部街区突然断电，当时我和我的邻居T君正在房顶挥舞着战绳¹。看到不遥远处刚才还灯光明亮的央行大楼突然暗下来，T君放下手中的战绳，叹道：“诶，停电了！”相较于T君的惊讶，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够来电。在向T君询问后，她给我的回答是至少两个小时，甚至可能整晚都不会来电。

我对T君的回答持怀疑态度。从我过去长期（两年半左右）在这一街区的生活经历看，这里晚上从未停过电。即使是在盛夏用电高峰时期，德黑兰很多街区会出现长达数小时的断电，这里也较少出现断电现象，而且一般是在下午一点至两点间。该街区之所以停电少，是因为这一街区是伊朗的金融中心之一，伊朗央行也位于此，政府自然会优先保证这

1 战绳又称格斗绳、力量绳或大绳，是一种健身器材，使用该器材进行锻炼有助于提高身体协调性和肌肉力量。

里的电力供应。所以，我内心并不赞同 T 君的判断。于是，我好奇地向 T 君询问她回答的依据。

T 君稍显激动地对我说：“今天停电之前没有任何通知，说明不是正常停电，很有可能是因为美国或以色列要对我们发动突然袭击。政府不知从哪得到了消息，为了防御空袭，政府采取突然断电，防止对德黑兰重要目标物的打击。所以到天亮之前可能都不会来电。”

T 君的回答着实激起了我的兴趣。我本以为她会像我见过的多数伊朗人那样抱怨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的低效和不负责任，抑或用讽刺的口吻说一句“这里是伊朗”，却万没想到她会吧停电和战争联系起来。

我又向她进一步发问：“那至少两个小时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呢？”

T 君说：“咱们的这个街区归阿格达西耶那个电力局管，现在又堵车，赶过来到修好怎么也得花两个小时。”

她的这一回答又回到了我可以接受的常规逻辑，那么合理，却又那么枯燥，远不如第一个新鲜。结果，二十多分钟后来电了。T 君并没有因为迅速来电而感到快乐，相反流露出失望的神情，或许是因自己的判断失误而感到尴尬，抑或是因回到合理、枯燥的现实感到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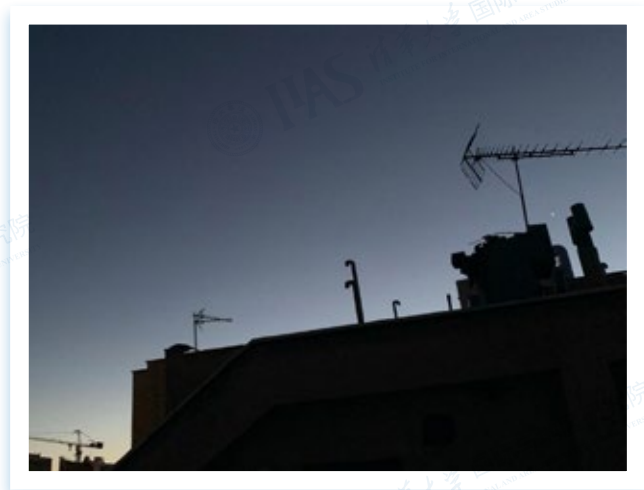


图1 停电后的米尔达马德街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黑烟与敌对破坏

今年1月初的一个黄昏，我和H君走在位于山丘之上的国家图书馆外，天空通透，万里无云。突然，H君指着东边，说：“发生了什么？！那里怎么有黑烟？”我朝他指的方向定睛看去，确实有一股淡淡的、正在散去的黑烟。

“又发生了爆炸？以色列干的。”他继续说道，“让我看看BBC。”之后他打开Telegram中BBC波斯语的主页，紧张地翻查着刚刚更新的消息。在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报道后说：“还没有任何相关报道，可能才发生没多久，还没来得及报道。”

H君的担忧并非毫无来由。过去一年中，伊朗多处发生蓄意纵火，旨在制造国家的危机景象。此外，之前发生的伊朗核设施爆炸、核物理专家被暗杀、德黑兰军火库爆炸、炼油厂火灾，这些也都被认为是以色列所为。

我问 H 君：“这回爆炸的又是哪里呢？”

“现在看是从东边的山里冒出的烟，那有可能是军火库，为了防止空袭，很多军火藏在山洞里。”他猜测说。

“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炸那里呢？”我问道。

“可能是要趁特朗普还在任上对伊朗开战吧，在开战前先打掉军火库，为美国登陆作战做准备。”他回答说。

然而直到第二天 T 君都没能在任何新闻报道中找到与黑烟相关的任何报道。第二天，T 君颇为尴尬地对我说：“昨天看到的黑烟可能是农民在焚烧秸秆。”

三、乌克兰坠机事件

2020 年 1 月 8 日，为报复美军在伊拉克刺杀伊朗圣城军总指挥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伊朗革命卫队对美国在伊拉克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动了名为“烈士苏莱曼尼行动”的报复性导弹打击。在报复打击后不久，伊朗革命卫队的两枚导弹相继误击了从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起飞不久的乌克兰国际航空 752 号航班客机，造成 176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其中大部分为伊朗人。

事后，伊朗革命卫队空军总指挥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指出造成误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度紧张备战状态下的人为失误。哈吉扎德在去年 1 月 11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最后很遗憾，因为一个人的仓促决定，导致了一个巨大悲剧的出现。”

客观而言，外界很难相信客机误击是因为高度紧张的全面备战状态所导致的。一方面，从伊朗对美国进行报复的整个过程和结果上看，伊朗在对美国进行报复时已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招致美军报复的可能。首先，伊朗从声称报复到实施报复中间隔了五天之久，给美国留足了时间进行防御和人员撤离。其次，在这五天里，伊朗相继通过瑞士和伊拉克向美国传递了报复目标的范围。最后，从结果上看，此次报复没有造成任何美军和伊拉克人的死亡，没有给特朗普政府任何开战的借口。既然伊朗在报复时就已经规避了美国报复的可能，事后又怎么会感到高度紧张呢？甚至导致一名士兵的失误呢？另一方面，误射一枚导弹尚且可以说是因为失误，但是误射两枚导弹显然有蓄意而为之嫌。

四、战争的近距离感

如果我们将 T 君、H 君的故事和乌克兰坠机事件放在一起，或许可以找到理由说服我们相信哈吉扎德所说的误击是因高度紧张戒备所致。从 T 君（家庭主妇）和 H 君（管理学本科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普通伊朗人的他们对战争的距离感很近，他们倾向于将任何突发的负面情况归为军事斗争的结果或先兆，营造出一种战争的即视感。同时，对战争的近距离感使得他们对于潜在的战争存在高度的警备，并可能对其作出过激的反应。就客机误击者来看，由于其职业属性，他在日常生活中对战争的距离感应该比 T 君和 H 君更近，而且当时又是在高度备战的状态下，留给他的判断时间又只有几秒钟，在这种情况下判断失误，作出过激

的反应（即连续发射两枚导弹）倒也情有可原。

理论上讲，战争的近距离感可能会导致个体的两种倾向，一种是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与稳定；另一种是加强自我警备。两种倾向之间往往并不矛盾，往往会同时出现，呈现出心理上反战与行动上好战的矛盾性。对于这些个体而言，不管他们热爱战争还是憎恨战争，战争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挑战和选项，他们必须去面对，甚至对其进行使用。因此，战争总是萦绕在这些个体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或许这也是伊朗人在地区内很容易展开军事介入的原因，因为战争就是他们身边的日常话题和常见手段，远非遥远的可怕仪式。我甚至感到 T 君和 H 君常常自我陶醉于战争的近距离感之中，因为这会使他们感到心跳加速，看到变革将近的希望。

五、对于战争的记忆

T 君告诉我，他之所以感到战争离自己很近，是因为他对战争的长久记忆。尽管 T 君真正亲身历经的战争只有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但是他却感觉自己自始至终都在经历战争。

“是，我们在两伊战争后是再没有卷入到什么战争中去，但是我们伊朗人一直被战争所包围。一会儿是阿富汗战争，一会儿又是伊拉克战争，紧接着又是叙利亚。这些战争都是一下子就发生了，而且都在我们身边。美国和以色列也天天嚷嚷着要进攻我们，我们一直都是在战争的阴影下生活。” T 君说道。



图片 2 伊朗神圣保卫战（两伊战争）纪念碑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来自伊朗阿瓦士的中年人 M 君也有过类似表述。2017 年 12 月的一天，在 M 君聊起战争的这个话题时，他对我说：“对于我们伊朗人，尤其是我们南部人（和伊拉克相邻的区域），战争是件很近的事。比如伊拉克突然就入侵了伊朗，天上不断有飞机飞过，我当时还是小学生，不知道是伊拉克的战斗机，我和小伙伴们还高兴地朝着飞机挥舞手臂。之后，战争的消息总是不断：美国入侵了隔壁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爆发，叙利亚内战，战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在 T 君和 M 君叙述时，我感受到的并非是对伊朗人民历经战争并长期生活在战争阴影下的同情，相反是一种平常感，甚至是偶尔流露出的自豪感，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是很难理解的。由于我的战争距离感很远，所以对战争的看法会理想化，不是对其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就是将其想象成为实现荣耀的“神圣仪式”，但总的而言战争在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仍然很少。而对于很多经历过两伊战争

的伊朗人而言，战争的距离感很近，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战争是他们克服过的苦难，让他们难过而又感自豪；战争也是他们未来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担忧而又有所期冀。

责任编辑：熊星翰 文字审校：董慧

同一屋檐下的租客 ——我在坦桑尼亚的女同事

高良敏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地区为坦桑尼亚及其周边国家

2016年2月5日，二房东内玛说一个叫朱玛尼的女孩要来租另一个房间。在2月6日傍晚，我在院子里见到了朱玛尼，个头硬朗，精神面貌佳。她正提着一个小箱子，背着大包往屋子走来。我简单跟她打了个招呼后，她便进入了所租的房间。2月7日早上8点，由于我需早早到医院，没有与她过多交流，直到下午6点，我在院子的书桌上整理田野笔记时，和她才有了正式交流。经过大致两周的交流，我得知她今年27岁，出生于坦桑尼亚南部地区，本科毕业于坦桑尼亚最好的穆希比利医科大学（Muhimbili University of Health and Allied Sciences, MUHAS），现就职于依法卡拉健康研究所（Ifakala Health Institute, IHI）。她不同于游离在家庭、宗教、女儿和“哥哥”之间的二房东内玛，也不同于少部分在医院艾滋病关怀与诊疗中心工作的来自上层家庭的志愿者，以及热心朴实的同伴教育员，她有自己的事业和独特而矜持的情感观。

殊不知，处于懵懂青春期的她，虽然也曾遭受过部分当地农村女孩经历过的遭遇，但却涅槃重生了，走出一条自己

的道路。在充斥着男权的社会文化场域之下，实属难得。



图 1 2016 年 2 月，我邀请朱玛尼和门卫共进晚餐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她眼中的男性

平时有空，我和朱玛尼就会谈及各种话题。言语中，她对未来事业、生活充满信心，与我碰到的很多当地女性不同，可谓“新时代”女性。

之所以“新”，是源于她懵懂青春期的坎坷经历及由此埋下的对抗男性、男权的种子。在初中二年级 15 岁时，她结交过一个男朋友，按照她的话说就是有钱的“糖爹爹”。在一年后，她被男朋友抛弃，因孕有一女，被赶出学校。幸运的是，她在母亲的鼓励和陪伴下，一步步走出了与无数当地农村女孩不同之路。她妈妈不仅坚持要她把孩子生下来，还得去继续上学、读大学，找更好的工作赚钱养孩子。对于

痛心往事，她表示自己非常恨之前的男人（朋友），她认为后者没有任何责任感！当然，朱玛尼知道在坦桑很多男性都缺乏责任感，不会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也不愿意为整个家庭付出，只是在家庭有钱或者是好的时候出现，一旦出现困难，就会逃避责任，离开妻子和孩子。她用一番坚定而有力的话语，倾述着痛苦和辛酸的过往。她接着说：

“坦桑政府对男人太宽松了，应该让他们在法律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应继续放任他们！我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就是这样的人，完全没有责任感，有了孩子之后就跑了，甚至根本不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这令我很伤心。好在，我有一个开明的妈妈。”

我回应她说：“是的，我在医院艾滋病诊疗中心也看到很多单身女子，她们很坚强很努力地在家干活，也有很多孩子都找不到谁是自己的亲生爸爸。”对此，她点了点头：

“在坦桑，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这种形式的婚姻完全是非正式婚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不过这也是很多地方习俗完全藐视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导致的结果，男性的责任完全为零。其实我知道，像我之前的男朋友，他不止有一个性伙伴，甚至很多。我现在必须忘记他带给我的无尽的痛苦。现在只想专心于事业，努力工作。今后，我也不想结婚，只想把女儿养大，好好培养她。”

她女儿现在巴加莫约的某私立小学上学。与很多当地英语教师较少的公立小学不同，私立小学有很好的英语老师，但每年得花费 1000 多美金的学费、餐费及住宿费。以她现在的收入完全可独立支持女儿上私立小学，她担心的是以后

进入大学和出国读书的费用。也正因此，她一直在努力地工作，增加知识和工作技能。她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有足够能力来支持女儿读书。



图2 巴加莫约镇上一所公立小学外景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她在埋下对男性厌恶种子的同时，也在控诉着这个男权社会，哪怕是她的父亲。正如她所言：

“坦桑尼亚男权社会是一个普遍、复杂的问题。在很多农村地区，男人都很懒惰，只在丰收的时候待在家里，把农产品卖了就离家出走了。家里的整个负担基本都是女人在支撑。你在很多市场上或者农村里，会见到很多男青年聚集在一起聊天，而妇女们却在农场里劳动。在大街上卖椰子的，基本都是男的，很少有女的，因为女人爬不了椰子树。男的有了钱之后，不是出去找其他女人，就是买酒喝，真是不负责任。”

在谈到她父亲时，朱玛尼也充满种种不满：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男人，有3个老婆，有很多孩子，在家里不做任何事情，但掌控了整个家庭经济和家庭开支，还经常出去找年轻的女孩子。我读高中是我跟我母亲在乞求他多次之后，他才勉强同意的。我非常痛恨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还拿着所有家里的钱在外面找女人。”

她眼中的母亲

提到母亲，她总是满满的感激和尊敬：

“妈妈在我人生中，非常重要，从小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她很清楚地知道，爸爸不会在学业上给予我太多的支持。在我初中怀孕时，妈妈的支持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她拯救了我。她通过小生意悄悄积攒起我读书的钱，还经常对我说：‘在坦桑尼亚都是男人的世界，大多数女人除了隐忍，别无它法。如果女人不受男人欺负和压迫，必须保持经济上的独立。作为女孩子，唯一能够摆脱命运的方式就是好好读书。只有读书，你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在大城市里生活，那里比农村好。这点对于女孩子来说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妈妈一直鼓励我的话，从小我学习很努力。后来，我犯了错，妈妈并没有怪罪我，她顶住整个家庭的压力，一直在支持我，我很幸运有一个伟大的妈妈。”

高中毕业那年，朱玛尼母亲逝世，对她是一次沉重打击，但母亲早期对她孜孜不倦的教诲，使她拥有一颗坚毅而向上的心。高中学习成绩一向优异的她，被坦桑尼亚最好的医科

大学录取。通过申请国家助学金以及学校奖学金，她最终完成了学业，并顺利在依法卡拉健康研究所找到一份全职工作。在回顾这段历程时，她说：



图3 依法卡拉健康研究所巴加莫约分所临床实验中心一角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我在农村长大，家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按理说家庭很难支持女孩读书。家庭也不富裕，幸好妈妈是个精明的小商人，有自己独特的眼界。她认为我应该去上学，不希望我跟很多农村女孩那样，年纪轻轻就出嫁。在妈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才有了这样的机会，一直读到初中毕业。遗憾的是，在我读高中时，妈妈去世，爸爸、哥哥和姐姐认为我没有必要再读书，希望我嫁人。按照他们的想法，16岁的我可以出嫁了，这样他们也可以获得不菲的彩礼。然而，我选择了抗争，选择了自己打工完成学业，就像妈妈当初告诉我读书才是农村女孩子的唯一出路。最终，我争取到爸爸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高中学业。然而，当进入大学时，我面临巨大挑战，去哪里找钱来支持我完成大学5年的学业？那时候，我

的人生进入了另外一个重要抉择时期。家里不可能再支持我，也没有那么大能力。我得想办法解决读书所需的费用。我很幸运，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获得了国家助学金贷款、学校奖学金。我的人生才出现了重大转折。”

对于婚姻

尽管坎坷和不易，但朱玛尼却拥有矜持的婚姻观。工作后，经济上独立的她，对于未来的情感与婚姻充满自信，相信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在她眼中，未来的丈夫不能是不负责任、寻求多性伙伴、婚外性行为的男性，必须是有责任感、有爱、彼此独立而相互依赖的“新男性”。这一坚毅的婚姻和情感观，尽显自主和自信。虽然与当下坦桑尼亚大多数人的婚姻观格格不入，但作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她在用自己的行动捍卫自己的未来。在2014年，朱玛尼来到巴加莫约出差三个月期间，她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一个在CRBD银行巴加莫约分行工作的职员。对于这次新的情感，朱玛尼有很多的期待。

“我想找一个特别的人，不同于很多坦桑尼亚男性的人。这个男人可以和我平等地协商家里的一切事务。同时，这个男人必须有责任感，不仅是对我个人有爱，对家庭也得有爱。这个男人必须和之前的男朋友不同，也不同于我的父亲。我希望，他可以接纳、包容我的过去，毕竟我是有女儿的人。但是我绝对不会逃避过去，过去的一切不幸都是我人生的重要经历。我很感激这段经历，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来面对未来。我坚信可以找到

一个负责的、有爱心的男人。这个男人同时也要像我一样保持经济上的独立，经济上不一定依赖对方，但在情感上依赖对方。我现在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可以找到想要的男人。我还年轻，我有时间去等待、去寻找。”

当谈到现在的男朋友时，我问：“他是你想找的人吗？他会成为你未来的丈夫吗？”就此，她的回答充满主见：

“其实我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虽然我们在一起两年了，感情上也很好。但对于他，我还有很多未知。比如他是否还有其他女人？是否也会找其他女人？是否有责任感？这些问题得一个一个解决之后才能做出是否和他结婚的决定。我希望，婚姻是强大而坚固的，不允许在婚姻中出现第二个女人。我还在考察他，一旦发现有不符合的，就会结束我们之间的情感关系。”

我又问：“那你现在的男朋友如何回应你的要求？他是否着急和你结婚？”

“他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已超过坦桑传统上大部分人的结婚年龄。他愿意给我更多时间来考虑结婚问题，也很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知道他很着急结婚，他的家人、朋友都多次催促过，但他未催促过我。其实，从现在来看，我和他应该可以走到婚姻的殿堂，但还需一些时间来了解对方。”

对于事业

在对抗男权的道路上，像朱玛尼这样的新时代女性，有

自己独立的思考，并未因为点滴经济收入的增加、稳定的工作而被淹没在男权的汪洋大海之中。就朱玛尼个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除了努力工作、不断提升自己专业上的知识和技能外，还在多方寻找处理婚姻、情感上的智慧和经验。她说想出国增长知识，继续开展疾病监测方面的研究。她还告诉我，目前正在积极申请去南非开展短期流行病学培训，也在积极地申请其他国家的培训和硕士项目。我向她推荐了清华大学国际公共卫生硕士项目（International Master for Public health, IMPH）。至于为什么如此喜欢出国培训、学习，她这样回答我：

“我出国学习、培训的目的是为了增强自身的能力，不仅包括知识、眼界，也是为了认知国外的女性如何处理婚姻和情感关系。我相信，每一个国家的女性都有自己的智慧、经验，值得坦桑尼亚女性学习和借鉴。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文化问题，与当地的文化有重要关系，不一定适合我们，但是我相信，总有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地方。坦桑尼亚社会发展太落后，很多观念依旧保守，男人那么强势，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往往很难逃脱出男权的掌控。这是我希望出国学习的一个重要目的。我在初中时候才开始学习英语，但是一开始我就努力地、认真地学，我知道英语的重要性。后来，我也凭此才在大学学习中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和在 IHI 工作的机会。在 IHI 工作期间，研究所有很多外国人，工作语言也是英语，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英语。”

第二，在涉及自己专业、工作事务上，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思考，并不一味地随波逐流。她的专业为公共卫生，对于当地公共卫生系统，她分析的视角不仅局限在表象问题或现实问题上，甚至还有来自政治治理层面的思考。正如她所说：

“坦桑尼亚的公共卫生系统，在村卫生室（dispensary）这一级存在很多问题。不仅医生的服务质量差，医疗设备方面也极其糟糕，很多医务室都没有冰箱，供电不足或电力不稳定。冰箱经常损坏，维修也跟不上。很多大一点的医院都没有救护车，很多村卫生室还在使用救护自行车。如果一个人要进行阑尾炎这样的小手术，一般医院都不接诊，医生除了使劲地开处方，毫无其他办法。要么推荐病人到更高级的省级、国立医院。我认为，这种处理是很荒唐和不可原谅的，这会造成病人的巨大痛苦和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是国家政治治理的问题，坦桑尼亚存在太多医疗腐败、管理不善。腐败不仅在政府层面，还在医生层面。很多医生都会把医院的药、设备偷走或者直接拿去自己的诊所，谋取私利，而非为了人民。相当一部分医生都会将病人推荐到自己的药店或者朋友的药店，而不是开具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另外，在县、省、国家级医院，很多医生都在公立、私立医院兼职，很多病人都被推往私立医院。因为医生会告诉病人，只有那家私立医院才有能治疗的药物。这里医生都非常富有，很多都是早上很晚上班，很早就下班，花更多的时间在私立医院和自己的药店。我认为是政府的问题，因为本身就很腐败，医生、官员是这个腐败链条上

最大的获利者。但政府或者很多人士都不会去反思或改变，因为他们就是其中一员。”

除了公共卫生系统外，她还对坦桑尼亚的医保政策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认知，经常下农村的她说：

“在农村一级的村卫生室，我认为那就是一个摆设，医生水平很低，根本没有病人，病人都去找传统医学的医生（traditional healer）和巫医去了。但我认为这不是村民健康知识不足、教育程度低下的原因。因为在农村地区，每年政府都会组织村民交钱，购买医疗保险，虽然最终村民们交的钱都由政府统一管理，但事实却并非政府官员说的那样，交了医疗保险，会得到一张医保卡，看病就可以省很多钱。在坦桑尼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公立医院中根本没有好的药，医生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在病人身上。最终的结果是，医疗保险政策完全是失败的，村民根本不相信政府能够为他们的健康努力。因此，很多病人只有在传统医学无法治愈的时候才会到医院，要么是得了艾滋病、结核病这种政府强制管理的疾病，才会到医院。前几天马古富利总统去最好的医院莫希比利国立医院调研时，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病人躺在地上，而不是睡在病床上，还有急救车完全无法使用。虽然他出台了一些措施，但是问题依旧存在。我个人认为，坦桑尼亚的医疗、公共健康问题之所以如此糟糕，一是政府治理上的问题，二是腐败的问题，三是整个社会都存在问题，医疗问题仅是其中之一，是系统性的问题。”

第三，她经济独立和努力上进，不仅为了自身，也希望回报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女性，同时也为了下一代。2014年，朱玛尼第一次到巴加莫约时，在碰到困难时得到了一个当地女性的无私帮助。她说那个帮助她的女人就像已去世的母亲，现在她也叫她“妈妈”。而为了回馈“妈妈”，她在巴加莫约买了一块地，盖了一间房子，打算开一个商店，交给“妈妈”管理。

“2年前来巴加莫约时，租了她家的房子，一个很小的房间。她经常帮助我，每天上班之前都要说一声：‘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到周末，都会让我去她家吃饭，说我平时工作很累，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休息。那段时间，在我孤独、困难的时候，都是她帮助我的，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她的丈夫前几天去世了，我这几天有空就会过去看望她，陪她聊聊天。以前，我每次来巴加莫约都去看她。我也叫她‘妈妈’，我在这里买了一小块地，盖了一间房子，明年可以建好，等房子盖好后，我出钱给‘妈妈’开个商店，多余的房间可以出租。那样‘妈妈’以后的生活就有保障了，也算是对她的回报，我也算在这里有一个真正的家。我也可以多一些经济收入，为女儿将来上好大学积攒一些钱。”

结语

因为海边天气炎热，我喜欢在院子里读书、看报、小憩或写田野笔记，尽管傍晚或晚上蚊子特别多，但在身着长衣

长裤，再涂抹上厚厚的风油精或者清凉油后，蚊子也只能干瞪眼。当朱玛尼从研究所回来，她见状，除了好奇和吃惊外，还给我取了个名字“Chinese mosquito”（中国蚊子）。在向我寻求神药之后，她也会将凳子挪到院子里，甚至还会拿出从达累斯萨拉姆带来的披萨跟我一起分享。天马行空般的闲聊成为了我们相处的方式。也正是通过闲聊，我们分享和了解了彼此。记得每次闲聊结束时，她常说：“只要努力，明天会更好！”

在当下之非洲，贫困压力和男权观念仍然盛行，尽管女性抗争仍前路漫漫，但诸如朱玛尼等诸多坦桑尼亚独立女性的个体史无疑让人相信——“只要努力，明天会更好！”



图4 我和房东喜欢在院子的Neem树下办公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责任编辑：李宇晴 文字审校：王琴

阿根廷的马黛茶文化

袁梦琪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国家为阿根廷

亲爱的，

拿好你的巧克力，

在这里我们是纯正的印第安人，

我们只喝马黛茶。¹

——【乌拉圭】巴托洛梅·伊达尔戈

因为疫情的阻拦，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当邀请西半球的老师们进行线上讲座或者是参会时，大家往往是选择北京的夜晚和他们的清晨。不论是工作在阿根廷的本土老师，还是定居美国多年的阿根廷教授，出现在镜头的另一端时，总是端着马黛茶杯向大家问候。在讲座和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之时，他们还会气定神闲地自顾自给茶杯里加上热水，再满足地啜一口。Che, ¿Tomás Mate?（朋友，你喝马黛茶吗？）看着屏幕里正在啜着吸管喝马黛茶的阿根廷老师，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这句话。这声问候，不由得让我回想起那些因马黛茶而聚起来的阿根廷日子。

1 乌拉圭高乔诗人巴托洛梅·伊达尔戈（Bartolomé Hidalgo）在回应费尔南多七世派来美洲的使节时写成的诗歌，西班牙语原文为“Cielito, cielo que sí, guárdense su chocolate, aquí somos puros indios y sólo tomamos mate.”

一、重走马黛茶之路

马黛树，学名为巴拉圭冬青 (*Ilex Paraguariensis*)，是一种常青灌木，喜好高温高湿的环境，在靠近大西洋和巴拉圭河的部分亚热带地区生长，现在阿根廷北部、巴西南部、巴拉圭及乌拉圭都有种植。从种子生发到首次采摘茶叶，需要四年的成长时间；此后每两到四年间可以再次采叶。头一两次的采摘大约每棵树可以收获 1-2 公斤的茶叶，但是等到生长 10 年之后，每棵树的产量可以提升至 100 公斤。采叶之时，仅取树梢尖端的叶子和较软的枝干，在收获的 24 小时之内需要将鲜切的茶叶进行直接加热快速干燥，这一步类似茶叶的杀青（西班牙语为 sapecado）；之后需要将茶叶放进一个被称为 barbacuá 的专用烤箱中进行间接烘烤，这一步主要是烘干茶叶的水分（西班牙语为 secado）；最后则是进行一次较为简单的研磨，这一步被称为粗磨（西班牙语为 canchada 或 mborobiré）。粗磨后的马黛茶叶其实就可以直接饮用，但是通常的做法是将其贮存至少六个月进行发酵，接着再进行一道精细的研磨，才得到我们现在常在市场上买到的细磨马黛茶 (mate molida)。至此，马黛茶生产的完整过程才算结束。

马黛茶最初由原住民群体瓜拉尼人发现并使用，他们认为马黛树是天神赐予的礼物，因此这种植物是一种神草。他们用葫芦作为盛器放入茶叶再加上清水后饮用，用自己的牙齿来作为过滤的装置；后来他们找到了较细的芦苇管，将这些芦苇管当作一种天然的吸管来饮用茶水。在瓜拉尼人的社群中，马黛茶叶不仅被用来当作日常的饮品，还可以被用作交换流通的“货币”。据传在 1592 年，巴拉圭的克里奥尔副州长埃尔南多·阿里亚斯·德·萨维德拉 (Hernando Arias de

Saavedra) 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俘获了一批瓜拉尼原住民，他们在这些瓜拉尼人携带的口袋中找到了一些被称为 caá (瓜拉尼语：植物) 的粉末。这就是马黛茶被发现的契机。最初欧陆血统的殖民者们对于这种陌生的饮品是抗拒的，甚至认为这是造成美洲人懒惰的“罪恶的草药”。但是此后他们发现这一植物具有和茶叶、咖啡相似的特性，于是开始将更为便宜的马黛茶作为其他饮品的替代物。同时，巴拉圭因为没有金属矿藏，也没有人口优势，所以西班牙王室希望通过扩大销售马黛茶来获取收益。许多的原住民被要求强制劳动，被逼迫着去雨林的深处寻找并采摘马黛茶，这种因采马黛茶而强制推行的徭役制度与其他拉美国家因采矿而流行的徭役制度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别。直到 18 世纪后期，耶稣会才破解了人工种植马黛茶的秘密，在传教士们的带领下，瓜拉尼群体被划入不同的传教区 (reducciones) 进行管制，他们在传教区进行马黛茶的种植、生产，甚至形成较大规模的马黛茶种植园 (yerbales)。于是马黛茶开始被大量地销往欧洲，更多地出现在民众的餐桌上，马黛茶的完整产业链也就此形成。但发生在 1865-1870 年间的三国同盟战争使巴拉圭损失了大量的人口，也丢失了大片的国土。巴拉圭的马黛茶种植园也因此被巴西和阿根廷抢走，这项马黛茶种植园生意的主导权转而被巴西获得。但是因为在 20 世纪初，巴西国内更注重发展咖啡种植产业，以致于该国的马黛茶产量在 1930 年代左右大幅下降，阿根廷继而成为世界最大的马黛茶种植国和消费国并延续至今。



图1 阿根廷小朋友在摆玩马黛茶玩具
 从左至右分别是烧水壶、马黛茶杯和保温杯的玩具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阿根廷境内，马黛茶的产地主要位于该国东北部地区的米西奥内斯省（Misiones）和科连特斯省（Corrientes），最初是高乔人的日常饮品，之后不断地将其魅力散发到了阿根廷的更多地区。现在马黛茶是阿根廷人均消耗量最大的饮料，每年人均消费约 5.9kg，与探戈、烤肉、足球一起被誉为阿根廷的“国宝四绝”。对于这样一种日常饮品，阿根廷人十分重视。在 2002 年，阿根廷成立国立马黛茶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la Yerba Mate），所里专家们的研究方向大多数集中在马黛茶与健康相关问题方面，同时还有改进茶叶品质、提高茶叶产出等研究。在 2013 年，阿根廷国会选举马黛茶为“国家饮品”（Infusión Nacional）。在 2014 年底，阿根廷正式批准每年的 11 月 30 日为阿根廷的“马黛茶日”（Día Nacional del Mate）。选择这天是为了纪念拉普拉塔联合省最早的联邦领导人之一的安德烈斯·瓜库拉里·阿蒂加斯（Andrés Guacurari y Artigas），他也是阿根廷历史上唯一一位

原住民州长，于 1815-1819 年间管理大米西奥内斯省，并在当地促进了马黛茶的生产和销售产业发展。在 2015 年我初到阿根廷时，正好赶上了人们第一次庆祝马黛茶日。节日里，在首都街头可以看到许多着装漂亮的少年男女向行人赠送小盒包装的马黛茶，人们举行游行、宴会、民族舞会等来欢度节日。

二、马黛茶的饮用礼节

马黛茶可以分为生茶与熟茶，和中国的茶叶相似，生茶更为涩口，而熟茶则更为绵和。一般而言，女生们往往喝的是熟茶或者是加糖的，而汉子们则是偏爱劲爽刺激的生茶。大部分阿根廷人冬天饮用热的马黛茶；夏天则是用冰镇的果汁来喝冷饮茶，这种混合饮品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冰镇马黛茶（Tereré）。不论何时，当地人都会背着一个大保温瓶给马黛茶续杯；而我初来乍到时看到他们不论严寒酷暑都背着保温瓶时，以为他们也臣服于神奇的东方力量，此后才慢慢地解开了这一误会。

其实在我看来，马黛茶似茶非茶。其所用器具、茶叶形态和饮用规矩，完全不同于东方的饮茶文化。首先是使用的马黛茶杯（西班牙语为 Mate），其材质可以是葫芦的、木头的、骨质的等等，大致都是“大腹便便”同时敞开大口的。其次，饮用茶水所使用的吸管（西班牙语为 Bombilla）多是金属制作，也有芦苇杆材质的。这吸管不同于我们平常概念中细细的吸管，它的粗细和我们平常使用的中性笔差不多，甚至更粗一些的都有，底部往往是封闭的圆形，这个部位上面会扎

有许多的小孔，为了让茶水进入而过滤掉茶叶。



图2 街边售卖的各种形状的金属吸管和马黛茶杯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制作马黛茶的过程中会将茶叶与细梗一起采摘、烘干，不同于中国茶只取鲜嫩的叶子加工；此外，马黛茶的茶叶之后会被打磨得细碎如尘，并不是国人普遍熟识的干燥的完整叶片。如果稍微挑剔的人，估计觉得阿根廷人就是在喝挑选剩下的茶叶渣吧。阿根廷市面販售的马黛茶分为带茶梗与不带茶梗的，以标识不同茶叶的刺激程度，两者并无品质上的差异；带梗的马黛茶因其口感更为柔和在市场上更受欢迎。还有混有橙皮、柠檬皮等果皮的茶叶，这种茶叶类型让我联想到了国内近几年火热的小青柑。他们也区分了茶叶小包装和大袋装，适合不同的消费人群。不过往往阿根廷人都是购买的大包茶叶，一次打开一份 500g 的茶叶，然后储存在家用封闭容器中，每日用勺舀出或者直接倾倒在茶杯中饮用，一家人差不多一个月不到就能消耗掉一包茶叶。

阿根廷人饮用时一般会向马黛茶壶中加入约四分之三杯

体的马黛茶叶（西班牙语为 Yerba Mate），然后用手掌轻轻盖住，倒过来摇晃几下，接着放正，拿开手掌后吹去表面附着的碎屑。此时杯中的茶叶应该是一边高一边低，将吸管插入较低的一边，然后顺着吸管将热水倒入，加入到一半即可，留下一部分较高的马黛茶叶处于干燥状态。这里对水温很有要求，不能过烫，一般在 70-80 摄氏度。曾经有一次在学院里，我拎着暖水瓶去给大家加热水，好给马黛茶续杯，结果被阿根廷朋友“嫌弃”水温不符合标准，于是朋友自己专门又去接了一趟热水。那个态度，相比于他们对待作业而言，可真的是高标准、严要求。另外，我还曾在位房东家的电热水壶上看到专门写着 Mate 的水温档，也就是水壶可以加热到刚好适合冲马黛茶的水温即停。看来即使是国际化的电器用品，进入一个国家后也少不得迎合本土化的需求。



图3 器具本土化

阿根廷的农业收割机内设有专门的马黛茶杯位和加水系统（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喝马黛茶时，最好不要“喝独茶”，常常是一群人围坐在一起传着喝，边喝茶边聊天；也可以是处在同一个空间中传递饮用，比如在阿根廷每次上晚课，教室里的同学们就会传递着马黛茶杯，边喝茶边听课。当大家一起围坐着分享马黛茶时，一般由一位侍茶者（西班牙语为 cebador）负责添

水和更换茶叶，然后按顺时针方向传递下去；每个人将杯中的茶水吸完后再递回到侍茶者手中，由他再次添水后，传递给下一个人。所以，马黛茶是作为一种分享的文化符号，不仅茶杯共享，连喝茶的吸管都是共享的。最初刚到阿根廷被邀请着喝马黛茶时，我接过茶杯还愣了好久，对于这种十几个人同时使用一个吸管的饮茶要求，我第一反应就是抗拒，觉得不卫生。看着上一个人用过的金属吸管我琢磨着怎么拒绝这个邀请，于是我解释道：“没有带自己的吸管呢。”如果说中国有劝酒文化的话，那么阿根廷人真的是很爱劝茶的民族。他们轮番上阵告诉我如果不喝马黛茶就等于没有融入阿根廷民族，缺少了必要的体验和经历。当大家伙热情又直接地给我解释了这一套“亲密无间”的饮茶之道后，我觉得自己遇到了最大的文化隔阂。但是随着我在阿根廷的时间渐长，我从最开始的小心翼翼到最终入乡随俗，不仅能跟朋友们毫无嫌隙就着同一个吸管饮茶聊天，也能和偶然遇见的陌生人一同喝着茶胡侃。据我个人的不完全统计，除开较为亲近的阿根廷朋友之外，我和学院的老师、访谈的教授、出租车司机、社区志愿者、贫民窟孩童、边缘省份私营户、理发店小妹、冰淇淋店老板，甚至房屋中介商都曾同饮一杯马黛茶。并且接到他人递来的马黛茶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谢谢”（西班牙语为 *gracias*），只有当我决定不再续杯时才以“谢谢”告诉侍茶者，“不必再递给我了”。当我第一次被“教育”可不要说谢谢时，当下觉得中国人的客气和礼貌在阿根廷看来是不适用了。阿根廷这马黛茶“必须”分享、绝对“亲密”的属性，挑战着我，让我不断学习，不断适应。所以我想，阿根廷古人或许也曾发出过类似“mate 吾 mate，以及人之 mate”这样的哲思吧，自己喝马黛茶的时候绝不会一人独享，

必然也会在茶杯中为旁人倒上一杯，传递下去。



图4 走访贫民窟时我与志愿者和居民们一起喝马黛茶后的合影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三、马黛茶饮之魅力

马黛茶是敲开与阿根廷人接触的第一扇门，也必然是遇到他们后需要好好学习的第一堂“文化课”。他们会邀请客人一起饮用，将客人纳入自己的朋友圈，直接将一种亲密的联系通过饮茶建立起来。人们通过对饮品、食物的分享，就可以创造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那些在一起喝马黛茶的人们，就社会作用而言他们团结在了一起，短暂地形成了一个亲密的小群体，使得外来人群可以迅速地融入当地。对于需要在阿根廷进行田野作业的人来说，分享马黛茶这一切口是相对容易打开局面的田野实操方法。在初到阿根廷期待着实现总统选举观察的我，就是借着一次次下午和朋友们一起喝马黛茶的机会被他们接纳，从最开始的被他们称为“不知打

哪冒出来的中国女孩”到“马黛茶伙伴”，我似乎因为这杯茶、这段一起消耗的饮茶时光而成为了阿根廷人群中的一员。



图5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科学院外的学生组织的桌子
一般到了下午时分，学生们都坐在这里喝马黛茶聊天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饮食模式与所属社会往往具有一致性，一起喝马黛茶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是阿根廷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鲜明特色²。分享与集体精神在整个社会，尤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中极为突出。不同于大多数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主流思想，阿根廷人骨子里其实对于共享、共存这种想法更为推崇，不论是表现在团体游行还是政治决策上，人们对于集体共赢的认同甚于个人获利的想法。在家庭中，更是需要全家人一同坐下来喝马黛茶，一同商量家庭事务，即使是人数众多的大家族，这样的团结时刻也是必要的。需要承认的是大家都使用着同一个杯具，饮用着同一个吸管这样一种沿用原住民的习惯，

2 拉美的其他国家，如乌拉圭、巴拉圭、巴西和智利部分地区都有喝马黛茶的习惯，其饮食行为背后蕴含的特殊性也与该地的社会组织形式相一致，与阿根廷的案例类似。

在现代社会的提倡小而精的饮食趋势看来会是一种略带蛮荒、粗糙的饮茶文化，但背后其实反映了这个国家和人民内在对于人情关系更为原始的依恋。至少我认为这种略微生硬、甚至强制的拉近距离的方式，远优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的冷漠。

不必多说，一起饮茶吧。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王琴

一条铁路，一个国家 ——肯尼亚铁路与殖民旧事

齐腾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肯尼亚

2018年11月，我第一次在肯尼亚境内搭乘蒙内铁路，从内罗毕前往蒙巴萨调研。截至2021年7月8日，作为肯尼亚唯一运行的主干线铁路，蒙内铁路已安全运营1500天。这条由中国公司承揽的铁路，自招标始，就饱受西方媒体诸如“造价昂贵、债务陷阱”，“干扰动物迁徙、破坏生态”，“中国工人不跟当地人同桌就餐、种族歧视”，“中国要求肯尼亚抵押蒙巴萨港”的攻讦。这些攻讦理由的真实性如何暂且不论，我们所关注的是，为何掌握英文世界话语权的西方媒体，对铁路方便人员、物资交流，改善基础环境，尤其是疫情期间增加运力积极抗疫的功能充耳不闻，反而一窝蜂地意图给蒙内铁路贴上污名的标签？西方媒体的这些操作固然有对铁路建设的舆论监督，有对中国崛起的深层焦虑，有对边缘地区居高临下的文明俯视，有对环保知识一知半解的无知无畏，但也存在对肯尼亚铁路与殖民历史的路径依赖。正是因为肯尼亚铁路史与殖民主义的羁绊关系，才为西方媒体的攻讦创造了想象的空间。那么，肯尼亚铁路是如何与殖民主义绑定在一起的呢？

为此，在2020年2月和3月期间，我多次走进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和铁路博物馆，查阅相关资料和走访相关人员，期待从“历史”的角度揭开这一纠葛的神秘面纱。

一、“铁蛇”缘何东来？

在英国人踏入肯尼亚内陆前，一个名为 Kimnyole 的基库尤人巫师曾预言：有一条“铁蛇”将会来到这片土地，这条“铁蛇”吞烟冒火，携带着一群红发碧眼的外国人呼啸而来，到时，草场会被撕裂，牲畜会被掠夺，土地会被抢占。这个预言，因肯尼亚首任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的著书立说而广为流传。若情况属实，那么巫师的预言受到了神秘力量的指引；若否，则可能是类比所遭遇的社会事件，后人附会前人的“袁天罡预言”。可无论如何，这条“铁蛇”于1896年从蒙巴萨登陆，一路蜿蜒向西，于1901年到达维多利亚湖，贯穿了肯尼亚这片土地。这条“铁蛇”便是肯尼亚历史上创建最早且影响最为深远的“乌干达铁路”。一条横穿肯尼亚的铁路，缘何取了一个邻国的名字？事实是，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乌干达，更确切的说，是为了控制白尼罗河的源头维多利亚湖。

查尔斯·米勒（Charles Miller）在《疯狂快车：帝国主义的娱乐》（*The Lunatic Express: An Entertainment in Imperialism*）中言道：“谁控制了乌干达，谁就控制了尼罗河；谁控制了尼罗河，谁就控制了埃及；谁控制了埃及，谁就控制了苏伊士运河；谁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也就间接控制了印度。”尼罗河涉及的利益太多，而白尼罗河的源头是维多利亚湖，若不提前控制，则法德诸国将后来者居上，挑战英国霸权。

在瓜分非洲狂潮的背景之下，1884-85年召开的柏林会议确定了瓜分非洲的“有效占领”原则，即西方列强在非洲占领土地或保护国时，必须通知其他协议国，同时要保证在占领土地建立起足以保护各种权利的统治权力。为了避免尼罗河水域控制权被法国或德国夺走，英国启动了乌干达铁路建设。在旁观者看来，乌干达铁路修建就是一个殖民主义的产物，然而在西方人的宣传语境中，修建铁路被赋予了更高的道德意义，即为了开发非洲、废除奴隶制以及传播西方文明。就国家机器而言，事实与宣传话语的背离与虚伪无关，毕竟国家行动需要进行合法性包装，而当时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和“白人包袱论”¹无疑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铁路修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尼罗河，然而，随着铁路蜿蜒向西，肯尼亚这片部落分散的古老土地被裹挟进了国家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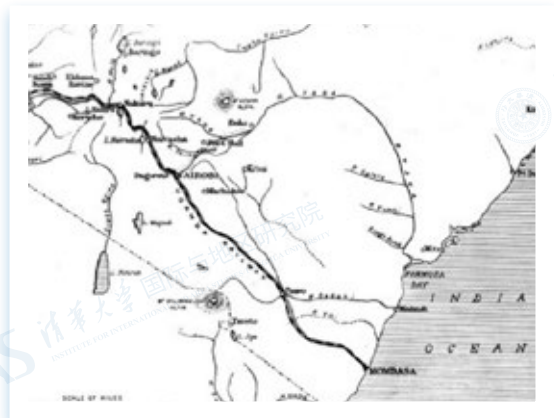


图1 乌干达铁路线路图

图片来源：Railway Wonders of the World

1 白人包袱论源于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白人的包袱：美国与菲律宾群岛》（*The White Man's Burd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认为给世界“野蛮地区”带去“文明”是白人的道德包袱。这一理念成为殖民主义的经典辩护话语。



图2 乌干达铁路一景

图片来源: Railway Wonders of the World

二、一条铁路创造一个国家

内罗毕国家博物馆和铁路博物馆的显眼处都悬挂着一个铭牌,上面写着东非保护国行政长官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的名言——*It is not uncommon for a country to create a railway, but it is uncommon for a railway to create a country*(一个国家建造一条铁路平平无奇,而一条铁路创制一个国家却百里无一)。也就是说,“先有铁路建,后有国家来”。国家之组成,无论按照“三要素”学说,还是“四要素”学说,土地、人口和政权皆为基本要素。那么,这条铁路修建与这些要素之间存在哪些联系呢?

2019年1月,我去铁路站点 Mariakani 与当地做医生的朋友 Moses 相见。当我们行走在铁皮房子围成的街道上,他跟我谈起了上一辈口口相传的铁路旧事:

“那个年代,我们非洲人从来没见过火车,甚至连镐和

锹都没有见过。英国人修铁路需要劳动力，我们自然不行，他们就从印度招募了苦力。因为修铁路，很多人涌入了肯尼亚，触犯了神灵。当铁路修到我们西边的 Tsavo 地区时，狮子们出动了，咬死了几十个印度工人。殖民政府解释说是狮子缺乏食物才吃人，可我们老一辈人不以为然。他们相信是已故的长老担心这些殖民者占领非洲人的土地、掠夺非洲人的财富，将鬼魂附着在这群狮子身上，警告他们尽快离开。晚上，这群狮子进入营地，将工人拖离帐篷并咬死了他们。这些殖民者开始在营地周围放置带刺的栅栏，点上篝火，企图吓跑狮子，可是没啥用。一些工人吓得逃离了营地，铺设工程也搁置了。英国主子来视察情况，结果也被咬死。当时英国人害怕地说，除非工人身上包着铁皮，不然没法继续开工。不久，英国人调来了步枪队，尽管我们祖先附身于狮子，非洲最厉害的动物，可最终还是败在了猎枪之下……”

非洲土地制度的命运也如同这些狮子一般，虽然顽强，最终也敌不过手持猎枪的殖民者。在英国人看来，通过与桑给巴尔签订的协议，他们已经“合法”占领了十英里海岸带，接下来应该将手“合法地”伸向内陆。第一任东非保护国行政长官亚瑟·哈丁（Arthur Hardinge）发现非洲人只关心对土地的占有，却没有地契。殖民当局开始寻求通过法律途径“合法地”在肯尼亚获取土地。1897年，印度劳工抵达肯尼亚不久，英国殖民当局就把1894年在印度制定的《印度征地法》（*The Indian Land Acquisition Act*）照搬过来。哈丁抓住机会发表声明：“为了公共利益，乌干达铁路自蒙巴萨始，无论土地延伸至何处，保护国当局都应该获得铁路左右两侧各一英里土地的所有权”，从而顺理成章地获取了土地。显然，

铁路两侧各一英里的土地满足不了日不落帝国的胃口。1899年，王室法律官建议将1890年制定的《外国管辖法》(*The Foreign Jurisdiction Act*)引进肯尼亚，授权王室控制和管理保护国内没有固定政权管理形式的土地，以及划拨给个人但遭到抛弃或无人居住的土地。1901年，英国颁布《王室土地条例》(*The Crown Land Ordinance*)，该条例于次年生效，授权保护国行政长官代表王室处置公共土地，而这些公共土地包括目前因条约、惯例、协议、国王保护国、1894年《印度征地法》或其他形式已经或者以后可能获得的所有土地。

乌干达铁路一路西行。1899年，工程队来到了一座高原，顿时感觉天气不似沿海那么炙热，常年体感舒适，这个地方本是马赛人的领地，因为有一条寒冷的溪水流经此处，故被命名为内罗毕(Nairobi，马赛语，“冷水”之意)。十几年前，马赛人还四处扩张，男性以勇武不驯著称，以猎狮为荣，被称为“马赛战士”。然而，1890年代的牛瘟、干旱、天花摧毁了这个地方，使之丧失了90%的牲畜和2/3的人口。奥地利探险家奥斯卡·鲍曼(Oskar Baumann)曾描绘当时的场景：“可怜的女人瘦骨嶙峋，双目呆滞；昔日勇猛的战士萎靡不振，无动于衷；老人们也都疲惫不堪，步履蹒跚；而成群的秃鹫在高处注视着他们，等待他们的倒下。”当乌干达铁路修建到此处时，这个地方已然人烟稀少，幸存者也都是马赛牧民。英国人见此大悦，认为此地没有定居农业，那便等同于尚未有效占领，顿时打算据为己有。其实，早在1893年，英国人就对内罗毕地区产生了觊觎之心。弗雷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游说修建乌干达铁路时曾指出，欧

洲人如欲在肯尼亚定居，非选择高原凉爽处不可。东非保护国行政长官查尔斯·艾略特则有着不同的考虑。当初他反对高额修建乌干达铁路（最初预计建设成本为 500 万英镑，最后建设的实际成本为 900 万英镑），而今铁路已经修建，却没法盈利，他不得不鼓励欧洲人来高原耕种，收回铁路建设成本，并为殖民行政管理提供资金支持。想要吸引欧洲人来肯尼亚耕种，那就需要提供足够的耕地。此时，在牛瘟、干旱、蝗灾、饥荒的打击下，马赛人生计艰难，不得不与英国殖民者合作。在洋枪的威慑下，1904 年和 1911 年《马赛协议》剥夺了马赛人保留区，将其压缩至与坦桑尼亚接壤的南部 Kajiado 郡和 Narok 郡，从而在肯尼亚高原上创造出了产权完全属于白人的“白人高地”。接着，白人移民行动开启了。



图 3 马赛酋长 Lenana 与行政长官 Arthur Hardinge（戴眼镜者）
图片来源：Mount Kenya Official Guidebook, Kenya Wildlife Service



图4 白人高地范围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1903年，在肯尼亚的白人只有百人，大多为南非迁徙而来，到了1914年，欧洲移民增加至1300人。铁路刚刚修建到内罗毕（于1907年成为首府）时，此地并无多少定居者，1902年至1910年之间，该镇的人口从5000人增加到16000人。初期的欧洲移民大都来自富裕阶层，暂且不说像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走出非洲》的作者）这种拥有爵位且享誉世界的作家，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普通移民的身上嗅到富裕阶层的气息，以及了解到他们是如何获取土地的。大象研究专家达芙妮·谢尔德里克（Daphne Sheldrick）在《爱、生活与大象：非洲爱情故事》（*Love, Life and Elephants: An African Love Story*）中记述了太舅公移民肯尼亚的过程：太舅公在南非过着富庶的生活，却对狩猎充满热情，时不时会

买一张前往肯尼亚的船票，坐上早期的蒸汽船以满足自己猎杀动物的渴望。1907年，在一次狩猎远征中，他结识了查尔斯·艾略特。后者提议，如果太舅公能够说服二十户人家搬到肯尼亚，政府就分给他们免费的土地，供他们定居使用。如此一来，单单太舅公一家就被赠予了多达5000英亩的土地。

但是，没有劳动力，土地几无用处。为了获取非洲劳动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涉及纳税、土著登记、Kipande（斯瓦希里语，“身份证明”）、保留地、强迫劳动、限制经济作物种植等方面。殖民之前，肯尼亚是无国家社会，并没有“纳税”概念。英国殖民者进入之后，1902年实施了房屋税（hut tax），1911年实施了人头税（poll tax），简单来说，是个茅草屋就要纳税，是个活人就要纳税。纳税需要使用货币，这就意味着没有货币的土著必须去农场劳动以赚取货币。如果不交税，等待他们的便是罚款，不交罚款，那就会被强迫劳动，“殊途同归”。除此之外，由于“白人高地”为欧洲人所有，所以留在此处的土著都是“非法占地者”，必须为土地所有人提供劳动。随着移民的增加，劳动力需求也在增加。若房屋税刺激劳动力增长的能力不足，则人头税接力，继续刺激。土著登记是国家控制民众的基础，了解劳动力的数量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资源。1915年，《土著注册法令》（*The Native Registration Ordinance*）被引入，所有成年男性作为可雇佣劳动力被强制登记。五年后，《土著注册法令》修正案出台，实施Kipande制度，规定年满15岁的非洲男性必须在脖子上挂着身份证件，上面包含个人的详细信息、指纹以及工作经历，以供检查。身份证主要的目的是限制土著流动，有效地跟踪劳动力资源。为了占据土地，避免土著的侵扰，英国

殖民者“画地为牢”，为肯尼亚各部族设置了“土著保留区”。之后其他部族被陆续限制在各自的“保留区”活动，这些所谓的“保留区”土地贫瘠、人满为患、生计困难。土著不得不出家门，为欧洲人的农场提供服务。强迫劳动因“诺西通告”（Northey Circular）而被合法化。诺西在1919年担任东非保护国行政长官，次年（东非保护国转为殖民地之后）担任肯尼亚总督，一直持续至1922年。1921年，诺西发布了一个通告，非洲人必须为欧洲人的农场和庄园劳动。而在此之前，保护国政府规定非洲人的强制劳动只适用于政府项目，除非绝对必要，且必须得到殖民办公室的批准。土著不被允许种植任何经济作物，如咖啡、茶、棉花、剑麻、除虫菊等等。由于土著没法依靠经济作物获取收入，他们只能依附于欧洲人的农场。

一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启动退伍军人安置计划（Ex-Soldier Settlement Scheme），为退伍军人提供土地。根据《东非保护国年度报告1919-20》（*Annual Report on the East Africa Protectorate for 1919-20*），在肯尼亚，这一计划共提供了1053个可供售卖的农场和257个免费农场，包含250万英亩土地，超过2200个申请者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土地。为了覆盖更多的白人农场，也为了方便白人农场所需原材料及其产品的运输，乌干达铁路的支线开始向“白人高地”延伸，Thika线（1913）、Lake Magadi线（1915）、Kitale线（1926）、Naro Moro线（1917）、Tororo-Soroti线（1929）以及Mount Kenya线（1931）陆续通车。

伴随移民的增多、土地的开垦和边界的厘定，1920年，英国正式将肯尼亚从“保护国”升格为“殖民地”，总督、议会、

政府机关、法院、军队纷纷得到设置，一个政权宣告成型，一个殖民国家随之诞生。

三、结语

百年前，乌干达铁路的修建，带来了殖民奴役，带来了种族歧视，带来了经济掠夺，带来了军事压迫；百年后，西方媒体以检讨和反思殖民主义之名，将污名化的想象再次投诸于与乌干达铁路平行运行的蒙内铁路之上。而事实真的如西方殖民祖先那样吗？

责任编辑：李音 文字审校：王琴

中国女孩在聂鲁达诗社的日子 ——中智诗歌交流的桥梁

汪可可

马德里自治大学西班牙语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智利文学

在智利的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居住时，每个周五下午我都会坐上 612 路公交车，蜿蜒着爬过几座山、途经一扇扇涂鸦墙、到达 Bella Vista（意为美景）山口下车，为的是参加聂鲁达诗社的活动。

下车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聂鲁达的巨幅画像，他微笑着，像是在欢迎我这位来自古老东方的客人。再往前走几步，穿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门，便是聂鲁达在瓦尔帕莱索居住多年的地方了。诗人给它取名赛巴斯提安娜（La Sebastiana），在《献给赛巴斯提安娜》一诗中他这样写到：

“我建造这栋房子
他们先把房子盖在空中
我随之将旗帜升上空中
让它风中飘扬
让它悬挂穹苍 悬吊星辰
在白日 在黑夜”

——献给赛巴斯提安娜（《聂鲁达诗歌总集》）

诗人所钟情的这座房子是幢独立的五层小楼，由橘色、天蓝色浑然拼接，远看就像一艘惬意地荡漾在大海边的小船。房子为聂鲁达和他的一个朋友共有，三层及以上属于他。

沿着楼梯拾级而上，便到了三楼。这里是聂鲁达的起居室和会客厅，里面还有一个精致的小吧台，让人联想起诗人和他的朋友们聚会吟诗的热闹场景。四楼是诗人的卧室，里面绘着“中国仕女图”的衣柜甚是引人注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聂鲁达曾两次应邀访华，写下多首歌颂中国的诗篇。顶层，也就是五楼，是诗人的书房，这里很是安静，还有大扇大扇的窗户面对着大海，十分适合写作。房前有一个宽敞大露台，它宛如甲板。站在露台上，凭栏望向不远处的大海，让人仿佛置身船上，漂在海中。聂鲁达有一部诗集叫《船长的诗》，也许在赛巴斯提安那就能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当船长的愿望。

从露台往下走，就来到了一个有着蓝色 S 型长椅的小公园，长椅若朵朵浪花托起了诗人的家，公园小路的尽头就是后来修建的聂鲁达智利诗歌图书馆了。这个图书馆里的藏书只有一种——智利诗人的诗集。单单收藏本国诗人作品的图书馆，大概是世界上很特别的一个了吧。作为诗歌大国的智利，诗人灿若繁星，很多当代诗人作品的首版都被收藏于斯，其中除了聂鲁达本人的诗集，智利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的作品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图书馆不只有借书、藏书的功用，还是聂鲁达诗社的主要活动场所。

一、加入诗社

聂鲁达在智利的三个故居——首都圣地亚哥的 La Chascona（巧思宫），瓦尔帕莱索的赛巴斯提安那和圣安东尼奥的 Isla Negra（意为黑岛），每一处都有以聂鲁达命名的诗社，秉承着聂鲁达关爱年轻诗人、帮助文艺界朋友的精神，给予青年诗人交流、成长的土壤，也承办着各类文学活动。

我第一次来赛巴斯提安那参加活动，便是在聂鲁达智利诗歌图书馆，只见诗集“砌成”的墙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上面放着两瓶印有聂鲁达头像的红酒。聂鲁达诗社的社长叫 Sergio，头发已微微发白，却容许着他小二十来岁的人与之逗乐，他似乎也乐在其中。在他给了我一个非常热情的见面礼后，我顿时放松下来。

按照诗社活动的惯例，Sergio 发给每人一小摞纸，上面印着今天要讨论的诗歌，于是大家开始读诗，按照座位的顺序，每人念上一首。社员们都在安静地看着、听着，也有人开始拿出笔在纸页上写写画画。读罢，大家便对今天的诗发表一番感想。Sergio 还给我们布置了个作业：写一首关于夜晚的诗，下周五继续在这里朗读、讨论。

一周后，“夜晚”主题诗歌分享如期而至，题材十分广泛，创作也很自由。有的社员描述了自己深夜在瓦尔帕莱索山间小巷里的所思所想，寥寥几句，灵性十足，极具哲思；有的全是大白话，甚至加上了几句“智利国骂”；有的痛斥当前政府对智利中南部原住民马普切民族的不公正对待；有的则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些漆黑的、痛苦的位于南方的夜晚……

活动结束之时，我喜欢走到诗歌图书馆的落地窗那里。巨大的落地窗在夜晚成了一块墨蓝色的幕布，瓦尔帕莱索的夜在这里应时上演，只见疏星点点落在了海中央，山间高高低低的房子也坠入了夜色……这是聂鲁达也曾欣赏的景致，轻易实现着你对浪漫的想法，引发人的无限诗情。

二、诗社活动

从那以后，聂鲁达诗社成了我在智利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像开头说的那样，每周五晚上我都会来参加诗歌讨论会；周六周日，这里也不时的就有新书发布会、系列讲座，或者纪录片上映等。此外，我们还会不定期参观其他诗人故居，比如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的故居、聂鲁达在黑岛的别墅等，因为诗社社员的身份，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被邀请参观很多未向游客开放的区域。



图1 诗社讲座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诗社的这些活动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 11 月的露天诗歌节。

聂鲁达诗社每年都会联合当地的文化部门举办露天诗歌节，通常会邀请另一个国家的诗人过来一起读诗。我参与的那一年，是第七届露天诗歌节，开了整整四天，邀请的是秘鲁的诗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智利本土的诗人团队中有马普切作家埃利古拉·奇乌艾拉夫（Elicura Chihuailaf），他于 2020 年获得智利国家文学奖。

诗歌节在当地一个剧院隆重开幕，其后的活动都会围绕涂鸦、电车与船只展开——那是瓦尔帕莱索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充满活力的特色名片。第二天晚上，诵诗活动设在露天涂鸦博物馆。其实，所谓的博物馆并非真正的“馆”，而是 Bella Vista 山的山坡，没有围起来的院墙，也不需要门票，凡有涂鸦的地方都是博物馆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诵诗活动就在一个山的转角处，只见一个诗人坐在那里演绎着自己的诗句，他没有直面观众，而是时而低头时而望向侧面，音调时高时低，他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中。诗人旁边还有个坐在箱鼓上的乐手，一只大狗在乐手的脚前安然入睡。听众们则坐在对面高高低低的台阶上，安静地托着腮，听得入神。

诗歌节的第三天，选址在海中央的船上。社长 Sergio 早早地就将船票发与我们，我和社员们一起走上发往大海的船只。行进到海中央，船停了下来，一起并列行进的，还有三只小船，其中一只是诵诗船。Sergio 首先致辞，秘鲁的客人们也依次登场，诗人的句子在太平洋的中央回荡着，而我们被小船盛着，随着海上的微波摇摇晃晃。彼时，我不禁想起

诗人艾青 1954 年前往智利给聂鲁达祝寿时写的句子：

“你爱海

我也爱海

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

——在智利的海岬上（《海岬上》）

最后一天中午，诵诗活动在瓦尔帕莱索标志性的交通工具——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运行的有轨电车上举行。绿色的电车会缓缓绕城一圈，到了哪一站，有人想上来读一下自己的诗，或者读任何的诗，都可以上来。我当然，也穿上汉服读了两首李清照的词，一首《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一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让异国的朋友们听到中国一千年前的女性旋律。

晚上，秘鲁驻瓦尔帕莱索的领事也赶来参加，没有任何冗长的发言，诗人依然是主角。领事馆只默默地准备了丰盛的秘鲁美食美酒供大家品尝。活动依旧是露天的，就在聂鲁达那个可以望见大海的露台上举行。那晚活动结束时已近午夜，大家端着残酒杯，和着音乐轻轻起舞，不远处的大海波光粼粼地张望着……诗歌节的每一天都给人带来了极致的审美享受。在海边的诗社里，谁都可以成为一个诗人。



图2 聂鲁达露台上的诵诗会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三、中智诗歌交流

诗社的朋友们都很爱东方的诗歌，李白、杜甫、艾青、海子的名字对他们来说可谓是耳熟能详，他们以“千年古国”代称中国，而“诗人”二字的汉语发音，在我们诗社，也是人人都会的。

有一次，我以李白的诗为例给他们讲唐诗。品“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赏“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们早闻诗仙的大名，这才通过一个中国人了解他的诗，原来他是一个这样洒脱这样爱饮酒的诗人！他们说，要是李白来智利，一定也会爱上这里的，这里的人们爱他，更有好酒供着！

我在诗社中也交到了我最好的智利朋友——Josefina Tralkán，一个在瓦尔帕莱索天主教大学读文学专业的女孩。Josefina Tralkán并不是她本来的名字，Tralkán是马普切语，意为“雷”。她说她希望能像天上的雷一样充满着力量，去唤醒

这片土地上沉睡的人们，那些漠视土著民族所遭受的压迫的人们，那些遗忘军政府暴行的人们，那些无视教育和养老问题的人们，他们或是只考虑自己的集团利益，或是对眼下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而这些，也都体现在了她的诗句中。她还告诉我，她下一年要学中文，因为想要读懂李白。她成了我最爱的智利姐姐，她也叫我妹妹。

我和 Josefina 一起合作了一本诗集，实际上那是我把她的诗翻译成中文后，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她，她视若珍宝，想要出版，在一番努力后，这个想法成真了。诗集发布会那天，Josefina 穿上了她最正式的裙子，我也穿上了汉服。我给她的集子写了一个小序，里面描述了我们的友谊。读完这段话，全场响起了掌声，我们这对中智姐妹也紧紧拥抱在一起。

分享结束后，人们涌了过来购买诗集，他们找 Josefina 签完字，也让我用中文写点什么，大概觉得这样很特别也很有意义吧。于是，我给他们写上对应的中文名字，再加上一句祝福。末了我们都一一合影。这天，我和 Josefina 收到了鲜花，能够一起做成这件事情，实在是幸福极了。



图3 诗集发布会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诗社朋友拍摄）

本届诗社结业典礼也是对外的，所有的社员都被推搡着上去读了自己的诗。在读诗的时候，我感到忐忑不安，还有些害羞，毕竟这是揭露个人内心最隐秘的角落的时刻。那天来了很多听诗的人，有的还对我们的诗作了点评。分享完以后我们就进入了酒会环节，不用像读诗前那么紧张了。有几个人拿着酒杯朝我走来，有人说很喜欢我的诗，有人说我的句子很浪漫，还有人说她从我构造的情景中想到了某个时段的自己，而诗社里那个整天穿着衬衫背着帆布包的忧郁男孩——19岁的文学系大一学生，则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的那首怀古诗里是否表达了某种哲学思想呢？

在这里，朋友之间互赠的礼物只有一样——书，最好是诗集。我在这收获的书，可以摆满整整一床。一次，在赛巴斯提安那承办的拉丁美洲青年诗人论坛上，我遇到了一位诗人朋友 Ernesto González，他送了我一本自己的诗集。给我题字的时候，我问他：可不可以用中文写我的名字？很简单的。他于是饶有兴致地照着我提供的字样描绘了一番。这定是他人生第一次写中文吧。

时光飞转，我在智利的工作任期也接近尾声。离别那天，智利姐姐 Josefina 送我去首都，我眼见着飞机要起飞，就要离开这片我生活了快两年的土地，脑海里回荡起艾青的《告别》，也是在这个机场写下的：

“不可能许下重聚的日期

就这样地，我离开你

离开我的兄弟

离开智利”

——告别（《艾青选集》）



图 4 Josefina Tralkán 与作者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诗社朋友拍摄）

分别的时候，Sergio 告诉我：“赛巴斯提安那就是你的家，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如今，我已离开我亲爱的瓦尔帕莱索两年多了，听说聂鲁达图书馆又装修了一番，场地扩充了一倍；2020 年的露天诗歌节因为疫情暂停了，2021 年的诗歌节或许在线上举行；运行了二十余年从未间断的赛巴斯提安那诗社也迎来了它的第 260 名社员……

海内存有知己，天涯亦是比邻。离这片土地很远以后，我和诗社的这群朋友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又翻译了几本诗集，办了几次线上的诗集发布会；我和 Josefina 组建了自己的诗社会团体，出了诗歌杂志，还建立了诗歌网站。

智利聂鲁达诗社，在中智之间架起了一座长长的桥梁，它跨越大洋，跨越时空，连结着志趣相投的人们。我，一个中国女孩，因为诗歌与智利朋友们联结起来的情谊，在时间的发酵下，也变得愈加醇厚。

可何时才能再相见呢？亦如艾青，我无法许下重聚的日期。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王 琴

偏见与傲慢 ——哈萨克斯坦抗疫实录

谢维宁

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一、导言

今年6月底，我暂别阿拉木图，取道塔什干辗转回国。飞机在西安降落的瞬间，远远望见工作人员全副武装的白色身影，人便不自觉地长舒了一口气。我注意到连他们的手机都被套上了密封胶套，这不禁让我想起了疫情期间的阿拉木图儿童医院，问诊台的护士们只在和病人说话时才勉强用口罩遮住嘴巴，依然将鼻子完全暴露在外。那是5月的一天，街上下着大雨，天气莫名湿冷，然而她们呼出的热气却好似会灼人，逼得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即使不看数字也能猜到，哈萨克斯坦的疫情在今年愈发地严重了。4月底，室友独自前往首都努尔苏丹实习，为了避免感染，一路上她不吃不喝，而且始终戴着口罩。初到努尔苏丹时，她做了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然而，检测结束后的第三、四天，她突然开始发烧、咳嗽，随即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得知消息后，我们都大感震惊。我和室友同住两年，深知她不是疏于防范的人，据她回忆，除了在检测

中心，自己并未在其它任何公共场所摘下过口罩。至今我们仍然不能确定她是在检测中心还是在其它场合不慎感染，但可以明确的是，3月，病毒已经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我们。

4月，学校负责外事管理的努尔兰老师全家感染，我又吃了一惊。努尔兰十分注重防疫，平时严格佩戴口罩，酒精不离手。疫情期间，他曾主动提出要给我们派送生活用品：“我先买好，喷上酒精消毒，放一天再给你们送过去。”饶是如此，他也没能抵抗住病毒的侵袭。事后听努尔兰的同事说，是他的孩子先感染了病毒，随即传染了全家人，好在他的妻小都是轻症患者，很快便痊愈了，他自己经过数日的住院治疗，也终于好转。

5月，我常去拜访的老奶奶一家也感染了。为了怕我担心，奶奶特意等到痊愈之后才告诉了我这件事情。电话里她言谈轻松，向我描述主任医师是如何关心她的病情，她又是如何携女儿女婿领着其它病友一起唱歌来抵抗病毒的。我一边感叹于她乐观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一边也感到困惑不解。老奶奶已经八十高龄，是阿拉木图最早的一批眼科医生、医学博士，且不说她因脊柱问题已经多年无法下楼，即使她能够出门，我也相信她的防疫措施一定是最为严格的。她常嘱咐我要用酒精消毒开门把手，还要用消毒水擦洗地板。她的女儿女婿也都是理科博士，按理说不应该疏于防范。后来老奶奶偶然提到在他们全家感染的前几天，她的女儿做了一个手术，曾多次进出医院。联想到疫情初期全哈的感染者中有高达20%的人都是医护工作者，我不禁怀疑老奶奶一家的感染源也来自医院。但由于哈国没有病毒溯源系统，我的怀疑至今无法被证实，只是偶尔静坐反思时，我的内心有着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现在想来，恪守防疫规则或者至少自认为严格防疫的人感染病毒并非没有原因。所谓的个人防护其实并不能由个人掌控，如果周围的人普遍认知错误并造成大范围感染，个人难免陷入十分被动的处境，病毒更是防不胜防。据统计，在总人口 1900 万的哈萨克斯坦，有超过 50 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可谓不严重。哈国如今的局面与普通民众对新冠疫情的偏见以及对科学防疫的傲慢有着直接关系。

二、识病毒雾里看花，偏听偏信

哈萨克斯坦的首例新冠确诊病例出现在 2020 年 3 月，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对疫情都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阿拉木图在 1、2 月期间甚至还出现了囤积口罩的浪潮。然而，随着第一例感染者的发现，民众仿佛听见靴子落地的声音，反而放松了警惕。现在回看，2020 年 3 月是哈国执行防疫最为严格的时期，或许正是由于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较少的感染病例以及过于“精准”的预测（哈国卫生部曾准确预测首例病毒出现的时间），普通民众产生了“政府只是在吓唬我，其实疫情并没有那么可怕”的错觉。疫情暴发初期，坊间甚至一度流传每日新增感染的报道只是政府用来骗取联合国援助的手段。

2020 年岁末，我在市中心阿拜大街上的一家商店购物。也许是因为店内商品大多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店主很关心口岸重新开放的时间，忍不住和我多聊了几句。临走时，这位

年轻的姑娘突然问我：“你说这场疫情是真的吗？我看周围好像也没什么人感染。该不会是政府骗我们的吧？”像她这样对新冠病毒将信将疑的人并不少见。疫情期间我一直住在青年学者公寓，一次，我在厨房遇到了自己的邻居，一位地理学博士。她直言老家的亲戚“从来不戴口罩，哪怕当医生也是不戴的，一点事都没有”，让我不要担心。我从未想过会从一位理科博士的嘴里听到不用戴口罩的论调，为此还特意查阅了哈萨克斯坦的中学教科书，结果发现关于病毒特性（包括传播途径）的介绍赫然出现在七年级的生物学课本中，同时还配有人类历次大型传染病发生的时间表。该书出版于2017年，读罢，我只觉得讽刺。



图1 哈萨克斯坦中学教科书上关于病毒特性的介绍，指出了RNA和DNA病毒的区别，并通过图片向学生展示了各种病毒的基本结构
图片来源：7年级生物课本 Atamura 出版社，2017版

此外，一些恪守防疫规则的人不幸感染了病毒，反过来又加深了周围的人对疫情的偏见。2020年夏末的一天傍晚，我在校园里偶遇了玛丽亚老师。玛丽亚在学校里讲授俄语，时常组织中国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疫情暴发后，大批中国学

生回国，留在阿拉木图的中国学生也找各种借口推脱，避免参加集体活动。然而，玛丽亚的工作量却不减，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给来自土库曼斯坦等其它国家的留学生讲解校园里各种设施的俄语说法。注意到她和她的学生都没有戴口罩时，我心中开始打鼓，正盘算着如何远远地打个招呼就快速离开，谁知热情的玛丽亚冲上来就要和我拥抱。见我动作迟疑，她笑着埋怨说：“没事的，别害怕啦！”拥抱过后，玛丽亚谈起疫情，言语中略带讥讽：“你不觉得越在意这个病毒的人，反而越容易感染么。你知道吗？我有些朋友，特别紧张，天天用酒精喷这喷那的，最后反而是他们先感染了，其它的人倒是好好的。”我深知玛丽亚的错觉只是出于“幸存者偏差”，然而要驳斥她却并不容易。上文提到的努尔兰，他有一位叫阿里的同事。虽然两人是多年的好友，但对待疫情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阿里行事豪放，开会从不戴口罩，逢人便握手。可偏偏这两人当中，努尔兰先感染了病毒，于是，两人的同事私下议论说注意防疫的人反而先感染了病毒。虽然阿里不久后也感染了，但是周围的人早已先入为主，认为防疫是无用的，越是讲究，感染得越快。

最后，医院不要求轻症患者住院，对痊愈患者少回访或者不回访的做法无形中让民众对新冠疫情更添一层偏见，以为新冠只是大号流感，感染了也不过如此。以我室友为例，感染期间，医院并未要求她住院隔离，所住的宾馆也没有采取特别的防疫或消杀措施。她搬回宿舍后，宿管也没有要求她做核酸检测。理论上，宾馆、宿舍都属于公共场所，在这些地方出现了新冠感染者或是康复的新冠患者后，都应进行消杀、隔离，然而哈国的工作人员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

一点。凡此种种似乎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感染新冠并不可怕，对工作生活无甚影响。偏见既生，防疫上的傲慢也就随之而来了。

三、防病毒流于形式，傲慢随意

回国前要处理的事情陡然增多，迫使我不得不频繁地乘坐出租车，相应地也不得不频繁地提醒司机佩戴口罩。大多数人一经提醒都很配合，然而也有少数让我印象深刻的司机。有一次，司机坚持不戴口罩，理由是自己已经接种过疫苗，我提醒他：“卫生部的官员昨天还特意强调，接种过疫苗的人也要戴口罩，他本人打过疫苗，还不是因为不戴口罩而感染了。”谁知他回了一句：“那是他自身抵抗力差。”在当地像他这样认为接种了疫苗便是穿了“金钟罩、铁布衫”的人不在少数。据当地媒体报导，截至2021年5月19日，全哈二次感染的人数达到了589例，到了7月8日，全哈已有2212名已经接种过疫苗的公民感染了新冠病毒。



图2 “请佩戴口罩”的红色标识后到处都是不戴口罩的年轻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即便是戴了口罩，也有不少人只是将口罩戴在鼻孔下方的位置，着实让人哭笑不得。上文提到戴口罩露出鼻子的儿童医院护士绝非个例，打开哈萨克斯坦的新闻，但凡报道疫情的新闻，画面上总会出现不少戴着口罩却把鼻子露在外面的民众。此外，还有全家出行唯独不给孩子戴口罩的家长；反复摘戴口罩，甚至将口罩揣在牛仔裤里只为应付检查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在办公室或大街上等公共场所拒绝佩戴口罩的人……处处透露出民众对防疫的傲慢与随意。仿佛所有的防疫规定都只是政府强加给民众的条条框框，至于为什么会制定这些规定，他们不会去深究，也不想深究。



图3 带着口罩却把鼻子露在外面的水果摊主和顾客
图片来源：7月19日哈萨克斯坦电视台晚间新闻截图

从2020年3月疫情暴发至今，哈国疫情主要经历了三轮高峰，第一轮高峰期在2020年7月，第二轮高峰期在今年4月，到了今年6月末，Delta病毒攻占哈萨克斯坦，感染人数再次直线上升，哈国进入了第三轮疫情高峰。哈国疫情的变化固然与世界范围内变种毒株的快速扩散脱不开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民众对待疫情的态度。哈萨克人

的春节纳乌鲁兹节过后，天气一天天回暖，各家的婚宴也陆续提上日程。尽管疫情期间政府再三禁止各种形式的聚集活动，但是民众的热情丝毫不减：市内酒店被关闭了，他们就偷偷地转移到远郊的宾馆，晚上警察严查，他们就等到下半夜再大肆宴饮。哈国地广人稀，疫情期间为躲避警察，甚至有人将婚宴转移到草原的毡房内举办。如此藐视病毒，怎能遏制传染？去年5月，楼道里搞卫生的阿姨顶着疫情高高兴兴地去参加婚礼，不久便出现感冒咳嗽的症状，再后来我们便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哈萨克语在祝人喜事连连时喜欢说 *Toi toiğa ulassyn*¹，直译过来便是愿（生活中）一个婚宴接着一个婚宴。与中式婚宴不同，哈国的婚宴上新郎新娘只负责端坐上座，吃饭看戏，真正的表演者是来宾以及受邀的各种乐队。亲朋好友在婚礼上既要载歌载舞还要比赛答题，因此婚宴不仅是他们生活中的娱乐来源，同时也是重要的社交场合。婚宴办得好坏直接决定了双方家庭的脸面。早在疫情前就有举债办婚礼的情况，如此郑重其事，受邀的人自然不好意思不去。尽管政府一再劝阻，然而一旦有人开了头，事情就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起来。就这样秉承着你办我也办，他去我也去的精神，哈国民众硬是让婚宴成了疫情传播的一大源头。

7月是哈国全民休假的时期，纵使 Delta 病毒肆虐，屡破新高的感染人数也没能阻挡民众放假散心的热情。回国后，我与当地好友通了电话，得知系里的老师不是在埃及、迪拜度假，就是在哈国境内参加各种婚礼，不禁替他们捏了一把

1 为了方便读者拼读，本文出现的所有哈萨克语均按照新版的拉丁化哈萨克语字母表拼写。

汗。一位名叫娜塔莉亚·杰尼索娃的博主曾在7月7日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哈萨克斯坦不能战胜新冠病毒”的文章，文中描述了疫情下她所在的克兹勒奥尔达市的居民是如何自顾自地参加婚礼、聚集在广场上乘凉游乐的“盛况”。在文章的结尾，作者自嘲地说她所居住的国家“无论发布什么样的禁令，人们总有办法绕过去。”然而，病毒不是人，它既不会收取好处，也不会因为听了几句美言就心慈手软。面对传播更快、毒性更强的Delta病毒，哈萨克斯坦民众自以为聪明的“绕过去”实际上绕过的是保护他们的口罩、疫苗以及条条禁令，这种骨子里对科学防疫的傲慢态度恐怕会让他们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四、写在结尾的话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戴上口罩呢？有的。回国前我参与编辑的一本书恰逢出版，编辑提议进行一个简短的视频采访，我再三推脱，理由是戴口罩受访效果不好，摘下口罩又有违防疫规定。编辑先是疑惑：“为什么您坚持要戴上口罩呢？您生病了吗？”在我的一番解释下，编辑恍然大悟：“哦，原来您是为了保护自己！那您戴上口罩吧，没关系的。”到了采访的那天，我突然发现整个采访室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戴上了口罩，与其它部门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直到采访结束合影时大家也未曾把口罩摘下，出版社其它工作人员看到忍不住劝说：“照相了就把口罩摘了吧。”负责摄影的小哥礼貌地拒绝：“不了，应该要把口罩戴上的。”回国后每每想起当日的情景我心中总是一阵感动，却又伴随着更多的钝痛。

热情好客的哈萨克斯坦人民宁肯出于礼貌为了我这个外国客人老老实实地戴上口罩，也不肯为了自己的健康认真地执行防疫措施。他们对病毒有着太多的偏见与傲慢，但抗疫不是写浪漫小说，偏见与傲慢不仅无法引向人们所期待的结局，反而会让更多有心防疫的人陷入被动感染的困境，而疫情的传播也只会随着变异毒株的出现而逐渐失控。

不出所料，哈国的感染数量在8月份持续飙升，感染率增加了两倍之多，这回连我那位一向对疫苗持观望态度的外教老师也忍不住将接种疫苗提上了日程。然而她计划了数次，最后都因为各种原因临阵脱逃。一次她又向我说起要接种疫苗的事，絮絮叨叨分析了一通，末了来了一句：“哎，谁知道呢？让老天保佑吧……”一长串哈语的音节从电话那头密密传来，结尾“森森”两声，让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森”是哈语祈使句第三人称的词尾，在拉丁化的哈萨克语中写做“sin”或者“syn”，翻译成中文是“让”——“他想唱就让他唱”的“让”。然而哈萨克语的“让”却常常出现在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外教在电话里说的“谁知道”直译过来就是“让谁知道”。这个语法现象曾让我一度费解，现在想来，这种说法仿佛承认了我们不能决定自己能否认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也是有一种更高层面的力量在“让”我们知道。而哈语中的“老天保佑”直译过来也是“让老天保佑”，本来求老天保佑已经是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而这个“让”字词尾，无疑让这种无能为力更添一层。除此之外哈语中的“就这样吧”使用的也是“让”字词尾，直译过来是“就让它就这样吧”。“谁知道呢？老天保佑。就这样吧……”合起来写做“Kim bilsin? Qudai saqtasyn. Bola bersin”。没想到这整齐的

“森”“森”“森”结尾竟构成了哈国抗疫的真实写照。重重偏见使许多哈国人民的认知至今仍然未能在正确的防疫手段和不被感染之间建立因果联系，而这种因果关系的破裂与他们骨子里的宿命论一旦结合，反过来又会极大地摧毁他们的防疫信念，或许这才是他们面对病毒如此傲慢的真正原因。

注：文中出现的名字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李音 文字审校：董慧

在仰光大学教课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姚颖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缅甸

2017-2018年，我在缅甸的仰光大学访问期间，我的缅甸导师，也就是当时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秋秋盛教授（Chaw Chaw Sein），邀请我给院里的本科生开两门课。我内心本来是拒绝的，一方面觉得自己资质和积累都不足，会误人子弟；另一方面觉得这项工作跟我的博士论文田野本身无关，平白无故耗费了时间。但是导师说了一段话让我无法推辞，她说：“2011年缅甸重新对外开放，仰大从2013年开始招第一批本科生，接收国外访问学者。这几年在国关院访学上课的老师不是欧美的，就是日韩的。他们的思维模式、上课理念都是偏西方的。但作为缅甸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能接触多个思考问题的角度，你是院里第一个中国来的长期访问学者，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平衡，让他们看到中国的视角。”其实，她这是继上学期之后第二次邀请我，话说得如此恳切真诚，我想如果要是再拒绝可能反而显得矫揉造作。虽然我自以为无法代表所谓的“中国视角”，但也许可以给学生们开一扇窗，让他们有接触中国学者观点的渠道。于是我就这样开始硬着头皮在仰大上课，从最初设计教学大纲到期末考试阅卷评分，完整经历了十二周的教学周期，亲身体验了一回缅甸高等教育顶级学府的运转方式。

一、学院背景

仰光大学是缅甸历史最悠久、最具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学。在英国殖民时期，仰大的前身是加尔各答大学的仰光分校，是英国殖民政府推行世俗教育、培养殖民官员的基地。1920年，仿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英式建校模式，仰光大学正式成立，部分英式建制也延续至今。之后在昂山、吴努等青年学生的领导下，校园里爆发了多次反殖民的爱国主义运动。1963年奈温将军发动政变之后，为了防止仰大学生聚集组织抗议，军政府颁布了大学教育法案，将仰大几个规模较大的学院都拆分了出去单独成校，比如仰光第一医学院、仰光理工学院和仰光经济学院都成了独立的大学。如今，仰大的主要强势学科是人文学科，一共有人类学、法学、国际关系等12个文科学院，化学、数学、物理等9个理科学院。



图1 仰大校园中大概是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仰大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都放置在“国际关系学院”的名称底下（虽然英文是 department，但其实是仰大的二级

单位，故此处译成“院”，而非“系”），两个专业的课程有一定的区分，也共享不少课程。国关是很受欢迎的专业，我在仰大那两年，国关系在近两年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竟是全校第二高，仅次于英语专业。额外插一句：传统来说，医学是所有专业里录取分数最高的，当医生在缅甸就意味着体面和高收入。但由于医学、经济学都已经单独成校，因此不在仰大录取线的排名范围。大部分医学生毕业后难以进入国营医院工作，有能力、有起始资金的医生会自己开私人诊所，其他则去了别的行业。正因为医生社会地位高，即便是不再从医的缅甸人也喜欢在自己名字前面加 Dr，有的翻译朋友不明就里，免费送给这样的缅甸人一个博士学位。例如若开民族党（Arakan National Party）的前主席、曾经从事过兽医工作的 Dr. 埃貌，到了中文里就成了“埃貌博士”。

言归正传。由于缅甸从 2011 年开始对外开放，不少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大量涌入缅甸并大幅招聘，英语流利、有国际交流经历的求职者成了香饽饽。因而也不难理解为何仰大自 2013 年招收第一批本科生以来，英语专业和国际关系专业成了报考热门专业。我导师很自豪地说，国关专业的学生就代表着缅甸最优秀的学生。相比而言，同一学院内政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就和国关专业的学生存在差距，这一点在我后续的教学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

甫一接触，国关专业本科生的英文水平的确让我惊诧。他们使用的教材都是英文原版，阅读的材料、课表、考试等文件也全都是英文。我旁听的几门缅语教授的课，课堂 PPT 全部是用英文制作，老师授课也是英语和缅语混用。我跟一些师生聊，大致理解了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殖民时期留

下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缅甸自身的国民教育体系并不健全，尤其是在国关这样比较新兴的学科，还没有缅甸语的教材，教授们似乎也没有动力去翻译教材，也觉得没有必要。

Third Year Semester I

Module No.	Name of Module	Credit Point	Hours per Week	Lectures	Tutorials
PS 1101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yanmar I	4	4	3	2
PS 1102	Foreign Policy I	4	4	3	2
PS 1103	Political Theories I	4	4	3	2
PS 1104	Political Economy I	4	4	3	2
PS 1105	Peace and Security I	4	4	3	2
*		4	4	3	2
Total		24	24	17	12

Total Credit: 24
Total Hours: 29

Care Courses
PS 1101 (4)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yanmar I
PS 1102 (4) Foreign Policy I
PS 1103 (4) Political Theories I
PS 1104 (4) Political Economy I
PS 1105 (4) Peace and Security I

***Elective Courses**
Law 2002 (2)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Eco 3001 (3) Economic Development
PS 3003 (3) Myanmar Economy and Society I

Third Year Semester II

Module No.	Name of Module	Credit Point	Hours per Week	Lectures	Tutorials
PS 1106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yanmar II	4	4	3	2
PS 1107	Foreign Policy II	4	4	3	2
PS 1108	Political Theories II	4	4	3	2
PS 1109	Political Economy II	4	4	3	2
PS 1110	Peace and Security II	4	4	3	2
*		4	4	3	2
Total		24	24	17	12

Total Credit: 24
Total Hours: 29

Care Courses
PS 1106 (4)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Myanmar II
PS 1107 (4) Foreign Policy II
PS 1108 (4) Political Theories II
PS 1109 (4) Political Economy II
PS 1110 (4) Peace and Security II

***Elective Courses**
Law 3006 (2)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Eco 3003 (3) Economic Development
PS 3005 (3) Myanmar Economy and Society II

图2 国关院的课程安排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缺勤的日常

我要教的两个班，一个是大四的国关专业学生，就是2013年招进来的第一届本科生，另一个班是大三的政治学专业学生。根据院长的说法，国关的学生录取分数比政治学高不少，实际上是因为选政治专业的学生少，为了招满，他

们不得不调低录取线。国关大四班的这门课是选修课，要求比较宽松，我导师说会与我合教，我的理解是我是辅助角色，顶多上一半的课。结果一学期下来，我导师就来了两次。政治学大三的课则是必修课，讲政治经济学概论，我感到诚惶诚恐。在参考了多份教学大纲之后，我拟定了非常详细的大纲，提前很久备课，倾注了不少心血，涉及经济学比较多的部分还专门找了牛津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朋友来客座讲课，但后来发现学生并不领情。国关学生的课虽然是选修课，但出勤率都高于政治学学生的必修课。



图3 客座讲课当天学生也只来了一半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开始接触学生之后，我才开始逐渐了解教学管理体系。政治学大三这个班，一共 19 个学生，4 个男生，15 个女生。这个班与选修课的班一样，有两类学生，一类是普通生，一类是优等生（honored student）。区别在于优等生是在二年级刚开始时通过了资格考试，从而获得了这个身份。这意味着几个区别：第一，他们可以在学校读五年，并且可以继续在学校读硕士，但普通生必须在大四结束时再参加一次资格考

试来决定是否可以在学校继续学习。第二，普通生平时考试 50 分就算及格了，但优等生必须 65 分以上才算及格。虽然满分是 100 分，但院长说一般最高只给到 80 分。第三，考试试卷也有区别，所以期末考试必须准备难度不同的考卷。实际接触下来，我感受到这两类学生的确有差别，可以用“越优秀越努力”和“破罐破摔”来概括，但也不排除个别特殊现象。

在仰光中资企业的朋友说，缅甸各种假期非常多，一年 365 天，工人工作的日子加一起不到半年。大学除了跟着全国公休，还有“寒暑假”，学生的话上学的时间就更少了。缅甸的学校学期安排是 6-9 月和 12-3 月。4 月太热且有泼水节放假情有可原，10-11 月为什么放假呢？大概是太凉快了学生正好可以出去玩耍？而一年真正有课的时间是 6-8 月和 12-2 月，也就是 6 个月，一学期总共只有 12 个教学周。其中还有各种假期、各种迎新、各种节日和庆祝活动。在这 6 个月的有限时间里，政治学必修课上，学生出勤率也奇低，政治经济学概论少有几节课是所有人都到齐了的。我对于学生不来上课非常无奈，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解决方案来。原以为是他们觉得我是外国人，好糊弄，后面一问，连大教授的课也是类似情况。我导师还因此而集合了所有政治学的学生，训斥了一番，但收效甚微。学校要求 75% 以上的出勤率才有资格参加期末考试，助教每节课都需要考勤。而第一个月我的课上，最高出勤率是 67%。这样下去，全班都会没有资格参加考试。听一个中欧大学的外教说，她的助教竟然帮助学生作弊，不在当堂缺勤的地方画“A” (absent)，以便相关学生下次来的时候可以补签出勤。

既然缺勤都是家常便饭，迟到就更不是新鲜事了。大概因为供电不稳，学校没有统一的上下课铃声，上下课时间也有很强的随意性。上课的教师、助教经常迟到，顶多说一句路上堵车作为解释，也无怪乎学生迟到了。诚然，仰大校门的雷丹路口（Hiedan）就是仰光的“五道口”¹，的确堵车很严重，但仰大师生的时间观念淡薄明显才是主因。最初，这种散漫随意的态度让习惯了学校教育纪律性的我感到极不适应，每次上课我都是9点按时到，等学生等到9点半。然而，我的守时和等候并没有感化他们，迟到的人毫无羞愧之意，于是我就干脆把上课时间改成9点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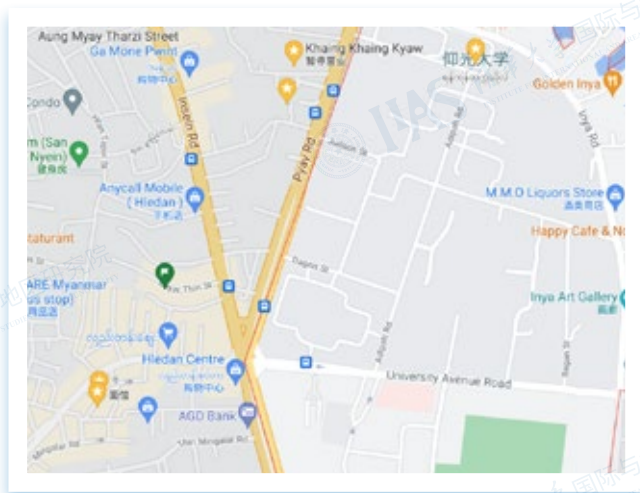


图4 仰光的“五道口”雷丹路口

图片来源：谷歌地图

三、期末：考学生还是考老师？

仰大国关院里没有专职行政管理人员，都是讲师或在读

1 雷丹路口位于仰光主动脉卑路的南北两段和永盛路、学院路、雷丹路的交叉口，是仰光上城区最堵的路口，拥堵程度堪比2019年交通大改造前的北京五道口。

博士生兼职做助教，教学管理一团混乱、效率低下。原本的教职人员设计承载不了近几年激增的教学、研究和国际交流的需求。国关院的师资力量明显不够，我访学期间院里只有3个正教授，4个副教授，7个讲师，但国关和政治学的学生总共将近1000个，师生比为1:71。教授往往是政府高级官员，偶尔还要去内比都开会、去军事大学给军官上课；同时还要对接与欧美、日韩等多个高校的校际合作，与外国使馆之间还有外事交流活动，更不用说自己还要做研究。每个老师都在超负荷运转，分配给本科生的授课时间完全不够。在我有限的观察下，平日里老师没有精力、也很难管住学生，只有期末考试才能体现老师的权力，没有来上课的学生就完全答不出题，所以老师们对考试的看重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

期末考卷要出AB两卷，每个班又有两类学生，所以一个班要出四套考卷。我跟欧洲来的两个做志愿老师的博士生聊天，他们的班任务更重。外教D的研究方法课上有80个学生，涵盖5个年级（政治学2-3年级，国关2-4年级），再加上要AB卷乘以2，总共要准备14套试卷，我真是非常同情她。不过可能因为我导师跟我比较熟，她说没有必要区别那么大，把顺序调换一下就可以是一套新的卷子。于是我就听了她的，稍微轻松一点。但我有两个班，一共得准备8套试卷，这考试真的不知道是考学生还是考老师。这位D外教略带阴谋论地说，其实她相当于在做五个老师的工作量，带着五个年级，而准备那么多套试卷也会被系里老师申报成五个老师的功绩。另一个外教S跟我说，院长在期末的时候突然问S，你这学期都在给学生教什么，他们都完成了什么任务，S早在学期开学就把课程安排的纸质版和电子版都发

给系里了，完全没有人关心或者记录。他觉得系里就是在把他俩当驴使（原话），还不尊重他们的劳动，也不承认他们的辛劳。

我们都准备好了期末试卷，需要提交给系里，系里老师过目审查了之后挑选出来然后上交给学校学术委员会，最后再确认使用哪一套试卷。我们三人课上都有助教，我的助教跟我比较熟，主要责任考勤，因此我的课她基本上都来听，尽管经常迟到。D和S的助教比较糟糕，到后来干脆完全不去听他们的课了，把考勤表交给他们自己弄。既然系里只是派了一个人给我们处理日常的事务，因此我们平时跟系里打交道，除了学生就是助教，系主任一般都见不到人。形成这个习惯之后，我们自然而然把期末考卷也给了助教。

我按要求把考题准备好了之后，用电子邮箱给助教发了过去。助教收到邮件后反应很大，马上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样做存在泄露考题的嫌疑，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我们甚至会被判刑坐牢，正确做法是将考卷存在CD里。我挂电话后还在怀疑自己听力出了问题，见面之后她又反复跟我强调了一遍。我无法理解——这不过是一个针对20个学生的系里的期末考试，一个对其他一切都不在乎的教育体系，对于考卷的关心程度简直像对国家机密一样。

最初，我以为是助教怕黑客盗取信息，与其他外教交流后才彻底明白了原因——助教不被院系领导信任，他们并非真正是这个系统里的人。他们被提防，我猜想是不是曾经出现过助教收学生贿赂然后泄露考题的事件。但我其实不能理解这件事有多么严重，如果只是一个院系的期末考试，这中

间能牵扯到多少利益纠纷？院长知道我们三个外教把考卷交给助教之后，表情凝重，非常严肃地和我们谈这个问题。她显然非常慌乱，要我们把助教 U 盘里的信息马上删除。不过我是真的不觉得有任何意义，因为昨天拷的，到今天已经 24 小时以上了，要泄露出去早出去了。删除不过是走形式而已，而且使用磁盘修复功能也能找回文件。

D 后来跟我说，他们这两个外教都不被学生喜欢，因为据说其他老师或者助教早就在课上把考试答案发给学生了，只要把答案背了都能拿满分。我虽然也没有提前给答案，但我的十几个政治学学生跟我私交还挺不错，我是不是应该心怀感激？



图 5 政治学大三学生结课日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四、近况

在 2021 年 2 月 1 日军方拘禁了昂山素季等民盟领袖后，

教育成了军政府和民选政府争夺合法性的重要领域。仰大不愧为缅甸民主运动的先锋阵地，诸多师生带头发起罢课行动，积极参加公民不合作运动（Civil Disobedient Movement, CDM），即便是在新冠疫情不太严重学校重启的时候，也拒绝返校上课，拒绝为军政府服务。我的助教因为参加 CDM 而辞职，为谋生计，去了一家私营银行工作。我教过的学生几乎都参与了 CDM，其中还有一位男学生因为领头组织抗议而被关入了仰光臭名昭著的永盛监狱。从 2021 年 6 月开始，缅甸受到第三波新冠病毒的侵袭，学校又重新紧闭大门。在军事政变和新冠疫情带来的多重危机之下，过去的半年时间里，缅甸的教育系统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

我对缅甸教育体系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这篇文章的内容也不过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管中窥豹而已。但现在回想起来，各种偶然的时机，让我有幸能够作为一个教育行业的参与者，亲身经历了缅甸的改革开放。无论关于仰大的抱怨有多少，当时满是缺陷、但蓄势待发的仰大让人充满希望。仰大就是缅甸的缩影，花了半个世纪时间才准备好重新对外开放，尽管满员超载，但却正是方兴未艾；尽管步履蹒跚，但却是在迈向未来。如今，我的学生却告诉我，任何努力都丧失了意义，他们现在只能看到自己梦想的碎片。

责任编辑：郑楠 文字审校：董慧

漂泊的“胃”：作为成都与特拉维夫两地的异乡人

杨光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以色列与叙利亚

我是一个成都人，成都人以较为闲散的生活态度与对美食的认真追求而被人们所熟知。

成都是一座移民城市，曾有句老话叫“没有十世老成都”，我家也不例外。母亲一家是在 1835 年从北京迁来成都当兵的满族，父亲则是从重庆与湖北交界来成都求学的土家族。我曾以为不同方言与食物的融合能够使我具有比同龄人更强的适应性，但现实并非如此。在我 20 岁去往以色列留学之后，巨大的饮食文化差异使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未能融入其社会，游荡在当地日常生活之外。

一、融不进的他乡

在前往以色列之前，我以为在以色列生活最大的障碍可能是由当地宗教氛围所带来的。但是到了特拉维夫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座极为西化的海滨城市，沙滩上的靓女俊男让我恍惚间就像置身在电影里一样。虽然在安息日（周五日落至周六日落）期间街上人少了很多，但是相比起 70 公里外

的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与一座一般的西方小城并无太大的差别。真正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挑战的是不起眼的一日三餐。

成都有家百年老餐馆名叫盘飧市，虽然我并不特别喜欢这家餐馆的招牌卤菜，但我却非常认同其门口的对联：“诸肉还是猪肉好，百菜还是白菜香”。以色列饮食与传统川菜百菜百味不同，对我来说都大同小异，可以说是百菜一味。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只不过它的移民几乎都是犹太人。犹太移民将世界各个角落的食物带到以色列，但在一开始几乎都不合我的胃口，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是由犹太教中的洁食（Kosher）规定所造成的。犹太教作为一个律法性宗教，规定了信仰此种宗教人群生活的方方面面，洁食因此是犹太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洁食可以被理解为犹太人的上帝所规定的吃饭的规矩。例如猪肉不能吃（如猪肘子、回锅肉不能吃）；带血的食品不能吃（如毛血旺也不能吃）；奶制品和肉不能一起吃（如披萨上芝士和肉不能同时出现）。有了这些规矩，不同地区犹太人带到以色列的食物的完整程度也因此打了折扣。例如德国犹太人来到以色列之后，传统的德国炸肉排（Schnitzel，多用猪肉、牛肉）在以色列则变成了以鸡肉为主的变种，此外德国猪肘也不见了踪影。可以说，犹太移民确实给巴勒斯坦地区带来了许多外来的食物，但其中很多是阉割过后的原产地美食。

虽然犹太移民来自五湖四海，但在在我看来，各地食物在以色列的汇聚与发展最终似乎都变成了肉夹于馍的存在。肉夹馍形制般的食物之所以是以色列食品的代表主要有两层原因。第一，肉夹馍制式的食物在中东本来就广受欢迎。例如 Falafel 和 Shawarma（二者都是用面饼夹馅的方式所制成的

小吃，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素，后者是肉）都是广受好评的街头小吃，但在我看来，这两种食物与肉夹馍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是将馍里的馅换了换。第二，可能因受到美国的影响，以色列人也酷爱汉堡——另一种形式的肉夹馍。只不过受制于洁食的规定，大多数的以色列汉堡是纯粹的牛肉汉堡，没有芝士，就连麦当劳也一样基本遵守这个规定。不同于国内的白吉馍、煎饼或者锅盔的刚中带柔，以色列的各种肉夹馍从里到外都特别硬。这使得我必须借助强大的咀嚼肌才能咬动如以色列国家性格般坚硬的本地肉夹馍们。但就算在以色列住了五年，每次吃这些肉夹馍的时候不仅嚼得我腮帮子生疼，而且还经常被硌得胃疼，上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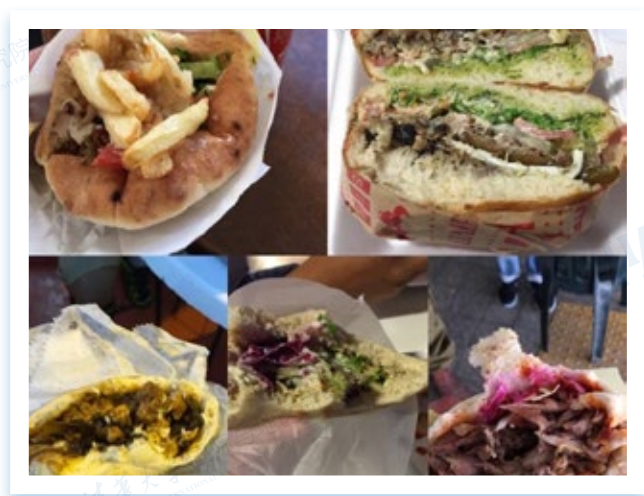


图1 以色列各种各样的肉夹馍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以色列饮食对我来说除了味道一般之外，其高昂的物价与难买的猪肉也是我日常生活的挑战。在以色列生活的几年中，我的恩格尔系数几乎是百分之百。包括大学食堂在内的许多餐馆对我来说都较为昂贵。虽然特拉维夫大学至少有7个食堂，但每个食堂的菜的味道我都不敢恭维。价格上，一

顿平常的学校食堂餐价格就高达 35 谢克尔，约合 70 人民币，味道仅仅是能下咽的水平，并且学校的套餐还在不断涨价。当我 2020 年初回特拉维夫大学的时候，同样的套餐已经卖到了 37 谢克尔一份。



图 2 特拉维夫大学食堂的一餐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从小吃川菜的我认为，川菜的精髓之一就是对于猪肉出神入化的料理，不管是将猪肉做主将的回锅肉，亦或是做点缀的麻婆豆腐。但在以色列的日常生活中，猪肉的料理难度对我颇大。在以色列是可以买到猪肉的，但一般本地的大型超市鲜有猪肉售卖，要想吃上猪肉则需要去找俄罗斯裔犹太人经营的肉店。只不过这些肉店的猪肉种类较为有限，且因屠宰手段不同而带有些许腥味。我所在的特拉维夫大学周边也仅有一家俄罗斯肉店有出售猪肉，并且其猪肉的供应也是时有时无。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中国人还较少，当地社区也没有几个中国人。每次见我去买猪肉，酷爱乒乓球的俄国屠夫小哥阿列克西(Aleksii)总爱冲着我嚷嚷：“张继科！张继科！”

美中不足的是，这家店所出售的猪肉多为价格较贵的猪排（一块猪排约3两，售价为25谢克尔，约合50人民币），略有腥气不说，因为肥肉少，很难提炼出足够的猪油拿来做菜。后来我发现在特拉维夫南边中国建筑工人聚居的地方可以买到猪肉。在本科学习期间，因为课程压力极大，除了周末以外几乎没有时间可以做饭，想要去往南边就只能在周末。但我在以色列没有购买任何类型的交通工具，因此我出行主要依靠公共交通。只不过就算在非常世俗的特拉维夫，安息日的公交车次数也较为有限。此外，去往南边往返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再加上较贵的公交车费（单程5.9谢克尔，大约12人民币）等因素，也就基本打消了我吃猪肉的念头。

与川菜讲究百菜百味不同，以色列的食物对我来说似乎是百菜一味。此外，高昂的物价与味道一般的食物最终使得我在以色列期间的社交生活保持在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活跃程度。因为食物的原因，久而久之我也就放弃了融入当地社会的尝试，我并不想在这个美食荒漠里反认他乡是故乡。对此，我的心理学老师开玩笑地说这是我的口欲期还没过的表现，只不过我认为每个人可能都会对食物的味道有着自己的偏好。即便是以色列人，也有很多人在离开了家乡之后会想念洁食的味道。对我来说是百菜一味的以色列食物，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也一样是故乡的味道。家的味道对于每个在异乡的游子来说都是一种挂念。在这一点上，以色列的百菜一味与川菜的百菜百味并没有任何区别。

二、回不去的故乡

在以色列长时间的生活也使得我自己的饮食习惯开始改变。例如为了省时间图方便，我也开始经常吃让我胃疼的各种肉夹馍配以当地产的冰可乐，而不是坚持去做饭炒菜。此外，在吃着让我胃疼的肉夹馍时，想的不再是刚来时思念的烂肉豇豆，而是想着去换一家新的肉夹馍。不知不觉间，我对成都的饮食也不再抱有很深的执念了。

每年放暑假我都会回家，刚开始的时候还会去把小时候吃过的餐馆都再光顾一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比起大街小巷的川菜与火锅，我更愿意去麦当劳吃汉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以色列期间对某些食物的执念太深，使得我将原本味道一般的食物加上了过多的附加值，这些心心念念的诸多食物，在真正吃到嘴里的时候似乎也淡然无味。在成都待上一周以后，反而会开始想念以色列的肉夹馍们。但是我也知道，如果在以色列待的时间超过一周，我也一定会开始想念川菜。

当我发现自己对于成都食物的执念不再的时候，我曾以为是因为成都发展得太快所以丧失了原来的味道。但是后来静下心来才发现，变的不是成都的味道，而是自己的饮食习惯。同样的菜以相同的方法和原料在不同的地方料理也会有不同的味道。长期在外生活的我已经有了与家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同时我也未融入异地的社会，我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

三、尾声

在以色列我就是个异乡人，回到成都后也发现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最终成为了两地的异乡人。可谓融不进的他乡，回不去的故乡。如今兜兜转转到了北京开始新的生活，我也不再去纠结异乡与故乡的区别。想通了过后，我既可以在想吃以色列菜的时候找到合适的肉夹馍，也可以在想川菜的时候找到炒得刚好的回锅肉。若是以后再离开北京，离开学校，我也一定会想念在这里的烤鸭和食堂吧。

本文反映的以色列情况与感悟仅为作者 2014-2019 年间的个人经历，不代表任何机构的任何观点。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董慧

在想象与现实之间 ——记一次加蓬投资调研之旅

唐溪源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毕业生，研究地区为法语非洲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两年多的非洲田野调查经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对我而言，田野调查最具魅力的一点，是想象与现实相碰撞带来的认知成长。田野调查不仅仅是收集数据或案例的过程，从进入田野现场的那一刻起，研究者就会不断地感知和分析自己所接触到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而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全方位的观察。这种观察会对研究者脑中已存的想象进行验证和修正，从而达到认识的增长与升华。我在加蓬的一次田野调查，就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认识的成长。

一、“直升机撒钱”的都市传说

2019年6至7月，我受委托从喀麦隆出发前往加蓬进行一个课题研究。去加蓬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主要认知就是——加蓬人的收入高，加蓬的物价也很高。这个关于加蓬的初期印象，来自于我早年间的一段工作经历。

2012年我在某工程企业喀麦隆办事处工作时，曾接待过

一位来自加蓬的项目经理。当时，那位经理一路从加蓬驱车前来。负责开车的是一位加蓬司机，也是为经理工作多年的老雇员了。经理觉得司机的技术好，人品也不错，便决定带着他一起来到喀麦隆。

我问这位经理：“为什么要把加蓬的司机带过来，是因为工资便宜吗？”经理笑着对我说：“他在加蓬的基本工资是每个月 25 万非郎（当时约合人民币 3000 多元），到这儿我还得付给他出差补贴，每个月恐怕 30 多万都打不住。”我惊讶地问：“怎么这么贵？”因为喀麦隆司机的基本工资只有 12-15 万左右。经理解释道：“加蓬人收入高，物价也高，这工资在加蓬也就一般水平。”可能是我这个小年轻没见识的惊讶表情激发了经理讲故事的兴致，他又接着补充道：“小唐，你有所不知，加蓬是石油国家，有钱得很！早年间油价高的时候，政府还在大选期间用直升机撒过钱呢！”

从此之后，这个“直升机撒钱”的故事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后来，我又多次听到不同的人讲起这个故事，虽然各个版本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他们都再次加深了我对加蓬收入水平的原始印象。

我此次前往加蓬的目的是为了考察这个国家在水环境保护上的一些措施。在前期资料准备的过程中，我发现加蓬是一个特别注重环境保护的国家，该国将领土面积的 11% 划作森林公园，同时还制定了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投资计划”。我不禁将加蓬政府对环保的高投入与其国民的高收入传说联系起来。正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环保战略的实施往往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因此，很多发展中

国家在面对环保与发展的问題时，总是陷入一种“不可兼得”的困境。此次的加蓬之行，正好让我有机会验证自己关于这个高收入国家的原始印象……

刚下飞机，加蓬首都的现代化气息立马吸引了常年生活在喀麦隆的我，特别是海滨公路一线的风景，白沙蓝海映照着高楼大厦，让我感叹利伯维尔真不愧是“非洲小巴黎”（之一）！¹ 开出租的司机正好是一位从喀麦隆过来打工的大叔，我们俩一路交谈甚欢，共叙了“老乡”情谊，我还特意夸赞了他老家艾博洛瓦的美丽风景。可谁知，到站之后，这位喀麦隆“老乡”开口就向我要 5000 非郎！怎么，不是应该给我这个“老乡”打折吗？我在雅温得打车的时候，近似的车程可从来都只需要支付 500 郎，要是刚好坐在副驾驶座位，还可以和喀麦隆大婶儿拼车，300 郎就能坐到市中心！司机大叔略带无辜地解释：“加蓬就是这样的，5000 郎是友情价，不贵！”

我一想，加蓬是一座高收入、高消费的大城市，也许是我这个“乡巴佬”大惊小怪了，毕竟发生过“直升机撒钱”的真实故事。于是，我赶紧老老实实地将 5000 非郎奉上。下车之后，我来到了此次加蓬之旅计划下榻的酒店——“北京饭店”。所幸的是，这个“北京饭店”不像真正的北京饭店那般豪奢，价钱十分亲民，让我刚刚经历重创的钱包得到了喘息之机。

1 除此之外，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肯尼亚的内罗毕都曾在坊间被称为过“小巴黎”。

二、“北京饭店”偶遇投资人夫妻

“北京饭店”的格局与其他酒店的格局稍显不同：进门就是一个带卡拉OK的大厅，投影仪播放着国内时尚的歌曲，随时可以唱歌。傍晚，住店的客人办完事回到酒店后，可以在前台点一份盖饭，一碗菜汤（晚餐的费用已经包含在了房费里，无需额外支付），然后坐在大厅右侧的欧式双人吊椅餐桌前，吃上一顿热腾腾的晚餐。倘若肯多花几千非郎，还可以享用饭店准备的丰盛自助餐，在进门左侧雅厅的卡座上吃一顿中西结合的海鲜小火锅。入住这家酒店的客人，大抵是阔绰的。卡座区往往座无虚席，只有像我这样的穷学生，才会来到饭店右边的角落，点上一份盖饭和菜汤，坐在吊椅上慢慢地享用晚餐。

然而，到达“北京饭店”的第一天晚上，我就在双人吊椅餐桌上结识了一对来加蓬投资的夫妇，男的叫王大哥（化名），女的叫李姐（化名）。今天也是他们来到加蓬的第一天。“同在异乡为异客”，我们很快就熟络了起来。李姐告诉我，他们已经沿着非洲西海岸走了七八个国家。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专门前往异域旅行的微博达人。后来在交谈中才得知，他们是老家在广东的企业老板。

王大哥说，他们本来是在安哥拉开厂的，生意还不错。但近一年以来，安哥拉的社会治安越来越差。抢劫杀人的事件屡有发生。终于，在他听到第二位老友被杀的消息后，他的心理再也承受不住了，简单地收拾了下面就离开了安哥拉，工厂随之关闭，剩余的几十万美元贷款也打水漂了。毕竟，命没了，钱留着也没意义。

不过，王大哥夫妻俩并没有打算就此回国，而是计划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非洲考察新的投资市场。按照他的标准，新的投资地必须是在大西洋沿岸，靠近港口，最好是能快速投产的地区。交谈了半天，我发现王大哥对他具体想投资的产业有些闪烁其词，似乎藏着什么秘密。我追问了半天，也只了解到他的原料准备从北美过来，到了加蓬又要融化，又要打碎。绕了半天弯子，我突然有些懂了：该不会是洋垃圾吧？

王大哥见我猜透了他的秘密，只好有些理亏似的解释说：“是北美旧家电上面拆下来的旧塑料，不是那种脏塑料袋，脏的我也加工不了。就是把这些旧家电的塑料壳子运过来加工打碎成塑料颗粒，再运出去做塑料产品的原料。这种是干净的，你不知道美国人、加拿大人有多浪费，好好的家电扔了不少……”

我说：“加蓬号称环保立国，你这个投资恐怕人家不要。”根据我之前对加蓬招商政策的了解，加蓬对于外来产业的污染问题是十分敏感的。政府支持的都是那些绿色环保、经济附加值与科技含量很高的产业，要想把北美的塑料垃圾进口到加蓬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王大哥则不以为然：“我这个没什么污染，而且自从中国禁止进口洋垃圾以来，这些旧塑料在北美的消化渠道就堵塞了。现在去进货不仅价格低，有时候还能赚当地政府补贴。我也知道非洲有些国家这几年很重视环保问题，但毕竟还要发展经济。这几年油价跌了，加蓬经济不太景气，说不定也会接受这种投资。我投资的这种厂两年就能回本，第三年之后就是利润了，到时候有什么变化，关了厂子也不亏的。”

虽然我依然对计划的可行性深表怀疑，但王大哥和李姐看起来信心满满。为一探究竟，我决定先放下对水环境保护的调研，跟着他们一起前往政府部门咨询，顺便充当他们的翻译。

三、投资局与开发区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跟着王大哥和李姐出去“谈生意”。但要去哪个部门，我们都没有明确的概念。一番商议后，我们决定先去加蓬的商务部问问。拦下一辆出租车，我们直奔目的地。途中，我问出租车司机：“加蓬打车这么贵，那您一个月收入能有多少？”司机有些无奈地告诉我，看起来数额不少，但实际上要被警察罚款和路卡上名目繁多的收费抽去一大块，商品价格也很高，生活其实很困难，穷人很多。此外，加蓬从事出租车司机等中低端职业的往往都是邻近国家来的务工人员，每年还得交一大笔签证费。加蓬本国人数少，只要家里有些关系，当地人都会优先去政府部门或军队谋个职位。不过这几年经济不好，政府有时也发不出工资。至于“直升机撒钱”的故事，这位司机表示自己从未听说过。

说话间，我们到了加蓬商务部。加蓬和喀麦隆的政府部委有一个优点，就是进出都比较方便，一般不会有卫兵阻拦或是其它的繁文缛节。一番询问之下，我们才得知投资事务不归商务部管。但我们接触到的官员都表现得热情、有礼貌。一位女官员还细心地为我们画了一张路线图，告诉我们应该前往“国家投资促进局”。



图1 加蓬投资促进局外景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投资促进局设在市中心一座非常现代化的写字楼里。当我们将来访意图告诉秘书处后，一位女性副局长很郑重地在会议室接待了我们。她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一名年轻的女公务员在投影仪面前用流利的汉语向我们介绍了加蓬的招商政策，并着重推荐了恩科经济特区（GSEZ NKOK）。看起来，已经有不少中国投资者来此进行过咨询。当我们谈及准备投资的具体产业时，副局长只是略微迟疑了一下，但马上又表示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她还是建议我们前往恩科经济特区，咨询设在园区内的政府审批机关。随后，副局长又拿出几张表格，让我们给刚刚那位女公务员的表现打分，我们都打了满分。临走之前，我在门口与那位女公务员交谈了几句，得知她是外交学院毕业的硕士，刚刚回国并入职投资局。我对她回国学以致用做法表示赞赏，她笑着用地道的普通话回答说：“还行吧，就是待遇一般。”

恩科经济特区是加蓬政府与新加坡奥兰国际公司合资建

设的。我们在恩科经济特区内，也确实感受到了它的国际化与专业化。恩科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区位条件都非常优越。园区紧邻国道，距离首都大概一小时车程，有铁路经过，内设铁路装卸站台，还有驳船码头和集装箱码头。可谓公、铁、水三路俱全。尽管当时铁路还没开始运营，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建成的铁轨。在电力设施方面，园区有水电站专线保障，还自备燃油发电机组作补充使用。饮用水、仓库、停车场等公用基础设施齐备，基本做到了园区经济中常说的“五通一平”。由于园区内的木材加工企业比较多，管理方还建设了一个公用的木材干燥窑。王大哥和李姐也对恩科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赞赏。据王大哥说，他看过的其它几个非洲经济特区，有些连场地都不太平整，电力、道路、通讯也很难保障。而这里的船运、铁路运输都基本成型了，发展来料加工产业是相当方便的。

加蓬政府给恩科特区政策优惠力度也比较大。在税收方面，增值税、财产税、设备进口关税全免。所得税免十年，十年后再按 10% 的优惠税率享受 5 年优惠，而园区外的正常企业所得税税率是 30%。园区内的电费也比园区外便宜 50%，约 50 非郎一度电。园区方承诺获得的利润可以 100% 汇出加蓬，不受外汇管制措施制约。外籍员工数量也可以放宽，无需严格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比例。在产业选择方面，任何产业都可以在园区落地，但 95% 的产品必须销往国外创汇。如果企业生产的是加蓬从未有过的产品，则被允许在国内销售产品总量的 75%。在管理方面，园区实施“一个窗口办所有事”（guichet unique）的一站式服务。可在园内办理的业务包括：1. 创建公司；2. 缴纳关税；3. 缴纳所得税；4. 缴纳

增值税；5. 办理员工社保；6. 办理工作许可证；7. 办理工作签证；8. 政府单一审计月度申明，基本上覆盖了所有手续。可以说，园区在行政便利化方面达到了领先水平。

园区管理方对王大哥和李姐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甚至在我们最为顾忌的环保问题上，园区政府代表经过一番讨论和电话请示，最终也松了口：只要王大哥能用照片、视频等资料证明他进口的旧塑料原料确实是他所说的无污染家电外壳，环保方面就没有什么问题。王大哥也当场表示，自己可以提供所有这些资料。这次会见在融洽的氛围中结束，双方似乎都比较满意。

出了园区办公大楼，王大哥夫妇提出想要在园区内部随意走走，但不需要园方的陪同。我很快明白，精明的王大哥夫妇应该是想要验证园区优惠政策的真实性。李姐告诉我，他们之前参观过的很多园区也表示能够提供政策优惠，但落实起来都比较困难。随后，我们特意拜访了几位已经在园区开厂的中国老板和企业管理人员。我们得到的答复是，这些优惠政策基本上都落实了，除了税费返还效率比较低之外，没有其他大的问题。听罢，我们都感觉有些意外，我也对恩科经济特区再次刮目相看。



图2 恩科经济特区局部俯瞰

图片来源：加蓬经济特区中文网站

四、尾声

从恩科特区出来后，我还沉浸在这个高标准园区给我带来的惊喜之中，同时也为王大哥成功找到一个适合建厂的园区而感到高兴。在回去的出租车上，我接着之前的话头对王大哥说：“您跟您在北美那边的朋友联系好，把原料的视频和文字资料准备好，相信很快就能获得批准了。”王大哥的回答却令我大跌眼镜：“这个园区标准太高，可能不适合我。”我忙问：“此话怎讲？”他解释道：“这个园区确实条件好，但是太规范了，各项标准也定的很高，肯定会吸引不少优质产业来投资。现在，虽然园区很欢迎我，但过几年后，企业越来越多，我这种‘落后产能’肯定会不受待见，到时候环保方面给我开的绿灯就要关闭了。”随后，他又补充道：“园区目前的地租，我暂时可以接受，但也不算便宜，水涨船高，以后肯定会继续越来越高，到时候我的利润就变得很少了。”

如果我要在这投资，可能也选择木材加工行业，但这个行业需要一定的人脉关系，而且投入成本高，我现在还没这个实力。”

王大哥的一席话让我陷入了沉思。这时，我们的出租车被一个临时检查站的警察拦下。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出租车司机被警察罚了1万非郎。国际大宗产品市场的不景气，已经让加蓬居民感受到了明显的经济压力。政府部门、公务人员在不断突破自己的底线，底层群众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原本就已巨大的贫富差距被再次拉大。此刻，我已无心再去想那个略带戏谑意味的“直升机撒钱”的传说。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国家在发展困境中的挣扎与矛盾。

被罚之后，出租车司机心情不佳，便不再和我说话了，甚至关掉了车载音乐。出租车在路上快速地行驶着，我们四个人陷入了沉默，耳边只有这辆欧洲报废卡罗拉冲破大西洋海风的呼啸声。

几天之后，王大哥和李姐离开了“北京饭店”，再次出发前往下一个考察地。尽管认识的时间很短，我们已经把对方当作了自己的朋友，分别之时还有些许惆怅。后来有一天，李姐给我发微信说，他们找到投资的地方了，已经准备在那扎根。她还说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到我，希望我去找他们玩。不过，李姐在微信里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最终去了哪个国家……

责任编辑：李音 文字审校：王琴

宗教王国：沙特的礼拜与斋月

王霆懿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沙特及海湾地区

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两圣地（麦加与麦地那）的所在国，沙特王国是伊斯兰教实至名归的中心，宗教影响如影随形地笼罩着这个神秘国度。尽管是全球最大的绝对君主国，沙特国王也只是自称“两圣地的仆人”。我曾在这一地区生活两年，先后历经两次斋月，之后又多次短暂访问。本文仅以一位旁观者的视角，一睹这个沙漠王国的宗教生活。

一、浓重的宗教氛围

沙特王国兴起于1750年，由时任部落领袖穆罕默德·本·沙特·阿勒穆克林（Muhammad bin Saud Al Muqrin）联合宗教首领穆罕默德·本·阿卜杜·阿勒瓦哈卜（Muhammad bin Abd Al Wahhab）创建。作为瓦哈比教派的创始人，后者曾对穆罕默德·本·沙特国王说：

“您是伊玛目——穆斯林的领袖，我则专摄教务。”

其后，王国兴衰起伏，270多年间沙特王朝先后三次建立，均以征战和伊斯兰教立国。时至今日，王国依旧奉行传

统的伊斯兰教法，对日常的生活工作有严格的规定。除幼童外，女性均须戴头巾（Hijab，源自阿拉伯语）、衣着蔽体，很多人还会佩戴面纱（Niqāb，源自阿拉伯语）。男性同样要衣裤过膝，不能袒胸露背。王国境内一日五次礼拜，在此期间，一切商业活动停止，所有店铺闭门暂停营业。整个国家仿佛按上了暂停键，只能听到宣礼塔的声响。

对于人口仅有 3400 万的沙特王国，清真寺就有 94000 多座。在商业大厦和学术机构内部，随处可见礼拜室。人们的办公室内也常备礼拜毯。待到礼拜时间，人们会三三两两地向礼拜室走去，盥洗、礼拜、吟诵经文，而后再返回工作。我长期在图书馆研习，所在图书馆的馆长是一位叙利亚籍的老先生，为人风趣幽默，常身穿一袭白袍，辉映银白相间的头发，讲一口地道的阿拉伯标准语，尤其儒雅。老先生常与我讨论宗教问题，对于中国的宗教信仰颇为好奇，也惊诧于我们的无神论和多神体系。作为一位虔诚的宗教人士，他多次宣扬伊斯兰教的仁慈，却从未劝我信教。我有一位老师是来自约旦的女学者，她面目慈祥、知识渊博，养育了四个孩子，仍笔耕不辍。我曾目睹她对一部沙特阿拉伯通史的评注，字迹密密麻麻，十分详细，评价也极为深刻。作为经学家和历史学家，她不仅能够通背古兰经，而且对于宗教和历史典故如数家珍。如同图书馆馆长，她并未向我灌输宗教思想，仅在探讨学术时提及一些现状的宗教根源。我也曾遇到一些较为古板的经学家，开口便说“我只讲阿拉伯语”。但据我所知，大部分熟稔经文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运用英文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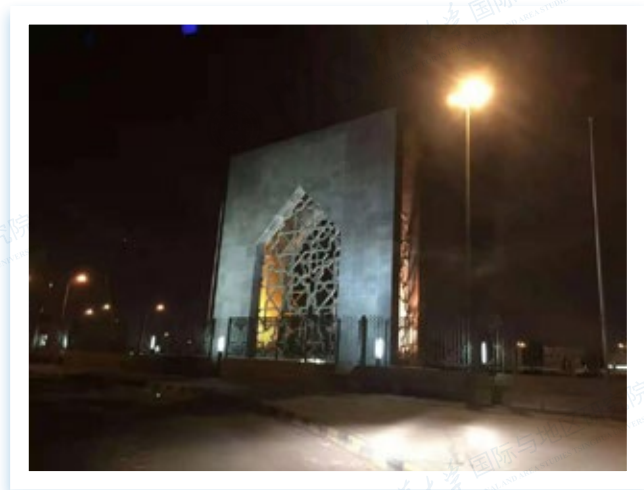


图1 沙特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我每日上下班的路上，都要经过沙特宗教警察的总部。这是一个独特的机构，作为沙特教统的维护者，宗教警察无处不在，有时甚至代行警察职权。尽管他们常穿白袍，却并没有统一的服饰。有一次我和朋友在利雅得中心的旧市场购买也门蜂蜜，与店主闲聊时得知店家旁边一个带袖章的白袍中年人就是宗教警察。这是我在沙特期间，与宗教警察少有的近距离接触，但也没有过多交流。

二、难忘的斋月

斋月又称斋戒月，阿拉伯语发音为“拉马丹”，意为“尊贵之月”，是伊斯兰历的第9月。先知穆罕默德曾说“拉马丹月是安拉的月份，它贵过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月”。由于伊斯兰历与公历相差10天左右，因此斋月可能出现在公历中的任一时间段。斋月期间，每天从日出到日落，穆斯林须停止一切饮食。老弱、孕妇、产妇和残障人士可酌情减免，行旅之人亦可在旅途结束后补足。

阿拉伯国家的斋月十分辛苦，却也令人记忆深刻。我曾连续两年在沙特和阿联酋度过斋月，如今回想起来，仍是十分奇妙的经历。2015 和 2016 年的斋月分别是 6 月 18 日至 7 月 16 日和 6 月 6 日至 7 月 5 日，正是中东地区酷热难耐的夏季。斋月前夕，人们便开始做各项准备，颇似中国的春节景象。有些人开始囤积粮食，有些人则更加注意饮食和身体情况。我的一位当地朋友，体质偏弱，也想把斋。她坚持整个白天不吃不喝，只在日出前和日落后饮食，几次差点坚持不住。虽然我不是穆斯林，但仍需外出工作和办事，囿于当地环境，在外期间也不得不停止饮食。



图 2 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因此，外出之前，我往往先吃饱喝足，准备一整天不吃不喝。所幸斋月期间，各个机构的上班时间缩短，人们无心工作，我可以提早回家。一天禁食禁水之后，全身无力、饥肠辘辘，但不宜暴饮暴食。最好先吃些流食或含糖食物，恢复下体力。斋月期间最困难的不是禁食，而是禁止饮水。海湾国家的 6、7 月份干热无雨，室外温度高达 40-50 度，地

表温度可达 50-60 度，甚至出现在车盖上煎鸡蛋的奇景。这种情况下，不能饮食对人体是极大的挑战。我有几次外出，完全没有吃喝，回到家已经很晚，只觉得天旋地转、身心俱疲。2015 和 2016 年间，很多老人因为把斋而体力不支甚至脱水，最终被送进医院。还有很多千里迢迢来麦加和麦地那朝觐的老人，既要禁食禁水又要奔波朝觐，身体难以承受，生命在此停止。

斋月后期，人们的脾气也变得更易焦躁。尤其利雅得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既要工作谋生，又不能饮食，十分辛苦。更何况上班时间缩短，人们着急回家，导致下午 3 点之后交通严重拥堵，更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回家之后，人们又会大快朵颐一番，走家串户，常常很晚才休息。利雅得的交通本就十分糟糕，一时之间，无论白天还是夜间，交通事故骤然增多，车祸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斋月期间的善行也随处可见。由于是“尊贵之月”，此时的善行更被伊斯兰教义认可。斋月的目的在于禁欲，使人们体味饥渴的滋味，不要奢侈无度，而要接济穷人。根据古兰经所言，“难以斋戒者，当纳罚赎，即以一餐饭，施给一个贫民。自愿行善者必获更多的善报”。因此，大街小巷时常可以看到布施斋饭和救济贫民的情景。有几次我和朋友开车行驶在利雅得的大街上，还接到路边施赠的斋饭。大街上的乞丐也更易讨到食物和金钱。有朋友告诉我，斋月期间，很多清真寺会收到大量的捐款，数额要远远多过人们的想象。

斋月之后的开斋节是人们最开心的时刻，其喜庆程度不亚于中国的春节。除了庆祝斋月结束，人们还会走访亲友，盛装饮食。尽管斋月中白天须禁食禁水，但由于饮食规律颠

倒，加上开斋之后畅饮畅食，人们的体重往往不会因斋月禁食而减少，相反会出人意料地增加。

三、社会变迁

沙特的宗教氛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多次改革变迁。2015年至2016年，我在沙特期间，全国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包括电影院、歌舞表演、音乐会、游泳、滑雪等，禁止女性开车，男女需分区就餐。沙特的大部分高校也是男女分校。但这也并非绝对，一些封闭的大型居住区，就有小型电影院和泳池。沙特费萨尔国王大学、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等高校实行男女混校。偶尔，我的朋友还会开车带我到利雅得郊外，一边吸水烟，一边吃烤肉，欣赏阿拉伯音乐。沙特浓郁的宗教气息下，隐隐暗藏着许多潜在的改变迹象。



图3 利雅得市中心法赫德国王大街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事实上，据当地朋友所述，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之前，沙特社会风俗并非如此保守封闭。女性可以不戴头巾或

者选择戴彩色头巾，衣着也不仅仅是黑色罩袍。人们的自由度更大，受宗教约束更少。这与我在阿联酋得到的印证相似，那一时期，什叶派民众甚至可以与逊尼派民众结婚，一位学生的爷爷和奶奶就是什叶派与逊尼派联姻。上世纪 70 年代，沙特有很多电影院，甚至有不少临时剧院播放印度、埃及、土耳其电影。

然而，在此之后，宗教氛围愈发浓厚，对人们的限制也越来越多。80 年代，越来越多的宗教抗议和保守运动导致政府不得不关闭影院。1983 年至 2018 年，除了东部石油港口胡拜尔（Khobar）有一座电影院外，35 年间整个王国没有其他的公开电影院。直至 2017 年，沙特政府才重新准许开设影院。次年 4 月，利雅得开设了首家电影院，呈现异常火爆的场面，一票难求。沙特甚至准备在今年底，在西部海滨城市吉达举办该国有史以来的首届国际电影节。不仅如此，2017 年，沙特还取消了女性驾车禁令，进一步淡化宗教对社会的约束。短短 3 年之间，宗教王国的反差之大令人惊叹。

四、结语

在沙特生活期间，我能感受到宗教无处不在的气息，但整体而言，这些对我的生活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近年来，沙特社会变迁异常剧烈，显示出沙特保守强大的宗教外衣下隐藏着巨大的变革力量。这或许能为这个古老的宗教王国带来崭新的变化，但这一转型是否可逆，王国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仍十分值得关注。

责任编辑：郑楠 文字审校：董慧

行走库拉河：高加索的山水时空

石靖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地区为高加索及东欧

自从 2015 年起，高加索意外地成为了我的朋友，我去了当地的雄伟山川，也特别关注了当地独特的山民文化以及民族性，在总结某一地区特质时，尝试使用某个具备概括能力的词语肯定是件省时省力之事，而高加索群山风貌一枝独秀的特点，的确是当地引人注目的标签。但回头来看，似乎对于高加索的理解还是过多关注了“山”。

回忆有感，发现曾经自己更多的追随了山的气概，花更多的精力关注高加索人性格中高山般的刚毅，却好似忽略了这里的山水还有人的其余特质。山、水本就是一对共生共存的事物，不论亲眼所见或是在案牍之上旅行，山水意境缺失了其中任何一项都无法被成就。回味高加索，峻峭挺拔的山峰之上覆盖着皑皑白雪，那是高加索之水的原始形态；由山麓汇聚的涓涓细流，诠释了高加索山水的共生关系；从山脉发源的水流密布滋润着高加索的土地，向更远地域空间输送山之力量与气质，而水则是灵活且忠实的媒介。



图1 第比利斯与库拉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高加索是地理分界线，关注高加索地区的各类文献也习惯于着重强调这一特点。大高加索山脉是欧洲和亚洲地理分界线的一部分，山脉以北是欧洲地区，以南则是亚洲。这条大洲之间的界线也扮演着国界线的功能，以北是俄罗斯，以南是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在内的南高加索地区。对于高加索地区的划分事实上仍存在多种版本，但在地域范围的差别之外，以大高加索山脉冠名的做法都保持一致。而大高加索山脉与位于以南的小高加索山脉之间的谷地，则是高加索南部地区的主要地域特征。在貌似屏障的群山之间，淌着赋予高加索灵动气息的水流。如果说山脉是分水岭、地理分界线，那么涓涓水流汇聚的高加索“血脉”则更多扮演着联系不同地域的作用。

人类的繁衍生息及文明孕育始终离不开丰沛的水源供给。存在早期人类活动踪迹的高加索地区，其穿越本地域的河流则扮演了供养者的角色。库拉河是大高加索以南的最大河流，作为一条国际河流，它发源于土耳其东北部，穿越格

鲁吉亚中南部地区后进入阿塞拜疆，并最终注入里海。正如全球不同地区的大河之于地域、民族以及国家的意义，随着不息的库拉河行进，不仅能阅览属于高加索的历史记忆，还会隐约发现当代高加索因自然地理元素连结的趋势：诸多故事片段正如河流生生不息，具有穿越时空、与山之阻隔相对的现实映照。关于行走库拉，我们选取几个有关的故事，试图通过这条河流串联起属于沿岸地域的记忆和现实。



图2 库拉河流域

图片来源：The EU Water Initiative Plus

高加索作为独特的地理标志出现在圣经故事当中，也的确是最早接受传教士布道的地域。相传在公元四世纪初，来自卡帕多奇亚的圣徒尼诺（St.Nino）将基督教带到当时的伊比利亚王国（Kingdom of Iberia，今格鲁吉亚东部地区），圣米利安国王（St. King Mirian）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这段光辉往事使格鲁吉亚成为了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之一。直至今日，由圣尼诺带来的“十字”，作为基督教的标志，被供奉在与格鲁吉亚旧都、同时也是宗教圣城姆茨赫塔隔河相望

的圣十字修道院内，圣徒尼诺之于宗教以及格鲁吉亚精神记忆的意义相当重要。



图3 圣城姆茨赫塔位于库拉河与阿拉格维河交汇处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重要的宗教意涵基于早期繁荣的人类活动，即格鲁吉亚旧都选址符合人文地理的一般性规律：在库拉河及其左岸支流（Aragvi）交汇处，便于交通、易于商贸。而时过境迁，曾属于这里的多种功能暂时回归记忆。纯粹的文化载体历经时间洗礼更添韵味，而关于阿拉格维河及其与库拉河交汇颜色差异的壮美景观则是每一个到访者都不会错过的。至于发源于高加索山脉南麓的阿拉格维河，则在公元前便进入希腊历史学家的视野，其黑水、白水支流在不同流域的分明区别以及融合也被人们用浪漫的爱情传说解读，甚至也存在将黑白两色借喻为中国的传统的哲学观“阴阳”。

因为广布的河流，库拉接收到了来自大高加索山脉的能量，在支流干流的交汇点形成了聚集的人类活动场域。尽管随时间推移，一些地域或许已经难觅旧时的风采，但沿着奔

涌向前的库拉河仍然可以定位历史的坐标，在遗迹之上构建想象空间。离开了格鲁吉亚旧都姆茨赫塔，我们沿库拉河逆流而上来到位于哥里附近的洞穴古城（Uplistsikhe）。

虽未能在中文中找到对应的固定译法，但关于这里的历史和传说足以使来自异域的我们直接了解涉及它的破碎记忆。这里是一个在岩石之上开凿建造的城镇，作为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意为“当地部落领袖的住所”或“要塞之王”的这座古城位于库拉河左岸，自公元前诞生至后续的发展阶段，洞穴古城见证了格鲁吉亚民族演进的不同阶段，而城边的库拉河一直滋养着她深爱的高加索大地。



图4 位于库拉河畔的洞穴古城（Uplistsikhe）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这座历经多个世纪的洞穴古城是依沿河地势而建，缓坡般的河岸之上开凿有不同功能的洞穴房屋，在内部甚至能分辨出不同用途的空间设置。开放式的公共空间用于城内不同的集会等场合。与我们熟悉的敦煌石窟等河西走廊文化遗迹不同，洞穴古城扮演了古老部落定居点的功能。之所以使用

“当地部落领袖的住所”来界定这一古迹，解释是基于部落领袖的强大力量和权威，而不同于地域内更多作为宗教载体的实体文化遗迹。在格鲁吉亚当地一些承载有历史记忆的典型地点，很容易辨别建筑或是地基的明显分层。因为战争等原因，一代代的本地人坚守记忆，在原始的精神基座之上重塑他们对现实的理解。这些位于库拉河边的定居点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洗礼，成为了高加索南麓早期人类活动的典型印记之一。高加索的土地是成就当地人类活动的基础，而成就地域文明则还需特别强调维系地域联系的库拉河。

谈及滋养高加索的水源，无论如何也跳不过一个名叫博尔若米 (Borjomi) 的山水之城以及当地出产的矿物质气泡水。博尔若米位于格鲁吉亚中南部，库拉河穿过这一久负盛名的度假疗养胜地。还记得第一次来到第比利斯，当地人并不是首先推荐作为旅游胜地的高加索山区，而是热情中肯地建议我多多饮用本地的水源。虽然还是无法适应入户直饮，但对于博尔若米矿泉水的钟爱确是瞬间达成。声名远扬的品牌效应源于产品质量，而产地优越的天然条件则无疑化解了生产线条件有限的不足。在当地的日子里，我总是随身带着一瓶“来自本地的问候”，先是味道真得不错，另外较俄罗斯矿泉水而言极其亲民的价格更是令人无法拒绝。

在百度百科中输入“博尔若米”，给出的解释是“格鲁吉亚生产的一种矿泉水的名字，这种矿泉水是格鲁吉亚出口的拳头产品”。很显然，在词条编辑者潜意识中矿泉水品牌显然更为出名。的确，对于高加索的小众国家，拥有如此特别的资源和品牌足以将其称为“来自格鲁吉亚活的传奇” (Live legend from Georgia)。拥有超过 130 年的开采历史，

博尔若米品牌的产品是来自高加索地表以下 8000 米的深层馈赠，其产生来自于地球内部的活动，因地下岩浆冷却产生了丰富的原生水（Juvenile water）资源。博尔若米矿泉水的网站介绍构思新奇，不失带入感和设计感地将生产商希望传达的信息特别彰显，其内容已经超越了经销产品的经济思维，而更多的感觉是将这款产品定位为格鲁吉亚的符号，向更广阔的域外传达格鲁吉亚的特质和理念。神奇的博尔若米矿泉水资源发现于俄国时期，而网站的传说却表示是因为“一头躲过猎人攻击但受伤的鹿。自此，包括尤里·加加林、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以及数位沙皇都寻求从博尔若米获得力量”。



图 5 博尔若米矿泉水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自从彼得堡触及了南境遥远的高加索，既有满目葱郁也有豪迈旷野的异域就对北方的斯拉夫人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在南部边疆跋山涉水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托尔斯泰曾创作以高加索为背景的作品，也都寄托了渴望静谧、纯粹的愿望。不少故事被人们赋予此地神奇理想的特质，而实际

上，本地化的滋养先于人的主观认识。位于库拉河上游的博尔若米矿泉水，像是一味灵气十足的营养剂，一直滋养着诞生无数故事的秘境。

短小精悍的介绍符合现代格鲁吉亚的思维，他们会在漫漫历史中寻找并强调想要凸显的、甚至忽略掉必要的情节，因而在陈述时会给听众一些断档般的生硬感受，但也给了解历史细节的受众一些想象空间。这些故事的讲述会受到极强的主观影响，或许也会带上时代特色，但无论如何，绿色的博尔若米以及地表以下的灵动则是不受人类活动支配的宝贵存在。小城博尔若米由于优质的水资源以及丰沛的植被，早已成为格鲁吉亚国内外旅游者的休闲度假胜地，高加索山与水的完美结合在这里被完美演绎。从考古发现千年以前的洗浴遗迹，到19世纪末沙皇下令建设的宫殿建筑，诠释了不同时代人们对于高加索水源的钟情。山脉依旧高耸，地下温泉仍然喷涌不息，而人与高加索山水的故事仍然在这座库拉河畔的小城中继续。

库拉河串起了高加索南麓的不同国家，在流经的不同地域与人类活动结合产生了多姿多彩的故事，除了以上在古代为利用自然资源沿河建造定居点、服务必要的经济活动、建立与当地精神生活的自然地理联通等，库拉河的国际性在当代也被流域国家所倚重。在经济地理层面，河流所扮演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运输，但显然库拉河的中上游的流量无法支持沿岸国家的运输需要，仅仅在位于阿塞拜疆的下游地区方能被利用。尽管如此，库拉河流经的土耳其、格鲁吉亚以及阿塞拜疆还是依照这条天然纽带建起了真正服务于运输和人

员交往的通道：BTK 铁路。参与方极力在宣传这一项目的国际化前景，认为其作为联通亚欧运输的新选择并服务于“丝绸之路”经济建设，而以三国在该铁路上的重要节点来命名还是更凸显了属于建设者们的战略共识。

库拉河流经的三个国家的差异很大，在这里强行使用同一过境河流作为共同点或许有些牵强。但是，如今因政治、经济等人为活动建构的联系的确是以上国家的现实，国家体量、历史背景等差异不再是库拉河流域国家现实互动版本的主要内容，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主要考量塑造了这三个国家的行为逻辑，并恰好形成了在高加索地区的一致性，如此人为建构出的现实连接再次与库拉河的轮廓吻合：地区大国土耳其和与其具备特殊关系的阿塞拜疆分别位于这条联系脉络的起始和终点，格鲁吉亚居于过境点，首、尾的重要性决定了中间部分的过境功能而不是决定作用，另外也与中间部分的外界选择有限直接相关。参与方都对这一促进高加索联通的项目抱有期待，而不得不说立场考量的区别以及地区环境的影响是其需要应对的问题。

在第比利斯时，无数次在城中穿过库拉河或是沿河漫步，倒是并没有太多关注这条过于平静的河流。专门为这条曾经朝夕相伴的河流做些功课，才发现回忆里的诸多内容都有它的身影。或许，库拉河的性格便是如此——不同于外界对于高加索以及高加索人的刻板印象——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一直滋润着这片土地，柔软调试着自己，使得高加索既具备力度也不失灵气。

责任编辑：李宇晴 文字审校：王琴

哈国警察故事

科里亚

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地区为中亚

2015年9月，我踏上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开始对这个国家进行近距离的深入观察。走出阿斯塔纳机场航站楼的那一刻，一位头戴红色大檐帽，穿着不合身、透着汗渍夏季警服的哈萨克斯坦警察就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长年在俄罗斯学习生活的经验使我难免对警察这一群体多了份敏感，与他们斗智斗勇的经历现在想想仍然回味无穷。作为苏联警察的继承者，独联体国家的警察系统大多同俄罗斯相似，而作为同俄罗斯羁绊最深的盟友之一，哈萨克斯坦警察更是吸收了之中的“精髓”。

中国网友对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警察是有刻板印象的：索贿、暴力执法、为难外国人等等，事实也与传闻中的情况出入不大。但两年间同哈国警察的数次“交锋”，让我对该群体和上述现象的背后原因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在抱怨的同时多了一分思考。

一、有惊无险

到达哈国第三天，我按照要求前往使馆报道，出使馆

后顺着 Saraishyk 大街向哈国外交部的方向步行，大约走了三百米后被一位巡逻警察拦下。

“请出示一下你的护照，年轻人。”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多岁，头发花白，挺着啤酒肚的哈族警察。

“怎么了，达瓦里氏（同志）？”我边掏证件边问道。

他明显的一怔，然后迅速恢复镇静。“没什么，例行检查。你会说俄语？”他拿着我的护照边翻边回道。

通过这个反应我意识到，他一定是眼看着我从使馆方向走来，认定我是中国人才将我拦下。“是的，我在俄罗斯读的大学。”

“啊哈，圣彼得堡。”他翻到我大学时期的签证页，抬头似笑非笑的问道：“那你一定对这种例行检查很习惯了？”

“没错，没错。不仅很习惯，而且什么都明白。”我也回给他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

他笑着合上护照递回给我，同时慵懒地向我敬了个礼：“明白非常好。欢迎来哈萨克斯坦，请在这里的时候遵守哈萨克斯坦法律。”

“当然，感谢您的服务。”

看到我转身离开，他走进路边墙角的阴凉处点着一根烟。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位置简直是绝佳狩猎点！中国大使馆旁边是爱沙尼亚大使馆和斯洛伐克大使馆，三国共用一长排使馆楼，有南北方两个出口。北边出口正对着的 Kabanbai 大街¹和

1 Kabanbai-Batyr 大街：阿斯塔纳一条贯穿城市的南北向大街，连接右岸老城区和阿斯塔纳机场。

Saraishek 大街是通往右岸老城区的必经之路，出口不远处的公交车站也给了警察充分观察目标的机会和时间。那么外国人在什么时候才会来使馆呢？大多只有初来乍到或者处理各类身份问题时。因此只需要两个人盯住一个出口，封住两个方向，就能将来使馆办事的外国人“一网打尽”。这种猜想也在后面的日子里被验证：Kabanbai 大街上距离使馆楼北出口几百米的位置上几乎永远有一名警察巡逻。那么被拦下的外国人中，有多少能够顺利脱身呢？

凭借长相的“优势”，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两年中，在街上被警察拦下盘问的情况屈指可数，但是在街头巷尾以外的空间，仍然有许多机会同警察碰撞出“火花”。

霍尔果斯口岸是中哈两国间重要的陆路和铁路运输口岸，是连接我国同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主要进出口通道。1989年开通的哈萨克斯坦扎尔肯特至中国伊宁的国际班车，承担着两国陆上边境的主要客运任务。2017年2月，我来到边境小镇扎尔肯特，登上一辆车牌开头为“新F”的国际班车，体验这条“通勤之路”。车票价格仅为三千坚戈（约合六十人民币），甚至比从阿拉木图市拼车到扎尔肯特的价格还便宜三分之一。车上不仅有前往霍尔果斯贸易区的哈萨克斯坦人、从哈萨克斯坦探亲或务工归来的我国哈萨克族，还有一些持商务签证续签需要出境的其他国家商人。一车人用哈语、俄语、中文和蹩脚的英文互相聊着，好像彼此相识已久。



图1 哈萨克斯坦扎尔肯特国际大巴场站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大巴车在缺少修缮、坑坑洼洼的柏油公路上行驶了约半小时。对于到过伊宁和霍尔果斯口岸中国侧的我来说，哈国一侧边境地区沿路建筑和设施的情况显得过于不尽如人意。出于调研目的，我在车上对沿途的所见进行了拍照记录，在抵达海关前军事管控区的闸口时，我瞥见路边一个不太醒目的牌子上禁止拍照的图样，便收起了手机。

进入海关楼等待办理通关手续时，身后一句带着口音的汉语吸引了我的注意：“诶，到家了，中国移动欢迎你了。”一对年轻情侣拿着手机在说笑。我下意识地兜里掏出手机解锁看了眼时间和未读信息。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我举起手机的一刹那，远处一个一直站着没动的警察将手里的警棍指向了我，用哈萨克语喊道：

“手机！放下！禁止拍照！”

我将双臂打开，手机屏幕转向他，示意自己并没有拍照或接听电话。

警察气势汹汹地走到我面前，一把夺过手机：“这里不能拍照，知道吗？”

“我没有拍照，我只是看了一下信息。”我用俄语回答。

“不是哈萨克（族）人？”

“不是，是中国（汉族）学生。”

他抬眼打量了我一下。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有一种心理预设，所以感觉他脸上一闪而过的表情是种难以察觉的喜悦。

“你知道吗，你刚才的行为是犯法的。”他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知道海关禁止拍照，达瓦里氏，但我并没有，你可以去查看监控。”

“解锁手机，打开相册给我看。”

“为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没有拍照。”

争辩声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一个同样在等待通关的哈萨克族大爷走上前来用汉语问我发生了什么，在听我解释后转向警察用哈萨克语开始交流，尝试着替我说情。我大概听懂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两人应该是彼此认识。大爷的意思是没有必要，大厅里很多人手里都拿着手机，以前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不用对一个学生抓着不放。但警察一口咬定他看到我拍照了，需要调查。大爷叹了口气，转向我小声的用汉语说道：“他就是想找茬，别担心，一会儿你给他塞点钱就行了。”我诚恳道谢，大爷便回去继续通关了。

在我坚持不能为他解锁手机展示相册的情况下，他示意我跟他走。过往的经验告诉我，这是要“小黑屋伺候”了。哈萨克斯坦诸如机场、火车站等设施的检查点同俄罗斯一样，一般都设有一个单独房间，单面玻璃。房间里有监控和联网系统，用来对“可疑分子”进行筛查。

“请出示你的护照。”我把护照递过去，他翻到签证页：“不是大学生？”

“不是，我是来进行访学的研究生。这次来边境也是为了调研。”

“什么专业？”他示意我坐下。

“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达瓦里氏，我要见你们领导。”我正色跟带我进来的警察说道。

“可以。”也许是没想到我会说出这句话，他反应了一下道：“你找我们的领导做什么？”

“只是想把刚才的事复述一下，如果确实违反了哈萨克斯坦法律，我愿意接受处罚。”我答道。

“那样可能事情就真的严重了，现在我只是需要确认你没有做违规的事情，需要你配合我，如果确认没有做的话我们之间就没有问题了。”他把手机递回给我：“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自己拿着给我展示。”

继续挑战警察把事情闹大对于一个外国学生来说确实不是明智之举。经过短暂考虑，我解锁了手机。他在我身边坐下，从相册底部向上翻起来：“这些，还有这些，都必须删除。”他双击屏幕选定了我从扎尔肯特

出发后在车上照的全部三十多张照片。

“这些照片都在海关区以外，路上没有禁止拍照啊？”我指着照片上的道路、商店、民房等向他分辩。

他从兜里掏出一部旧的诺基亚手机，拨通一个电话：“阿尔曼（人名），从扎尔肯特到我们站是不是禁止拍照，是吧？好的，我知道了。”然后迅速挂断，“我刚跟同事确认过了，整个路途都不允许拍照，所以你必须删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直接点了删除键，又熟练地点到“最近删除的照片”文件夹，把里边的内容全选删除。

整个过程看得我目瞪口呆，他却心满意足地站起身表示我可以走了，丝毫不提我没有在海关大厅拍照这件事：“你可以出去通关了，欢迎再来哈萨克斯坦。”“我不出境，我下一班车回阿拉木图了。”他给了我一个“您请便”的表情，就把我让出了房间。从事件开始到结束一共也就持续了十五分钟，而我是既气愤却又无奈。

二、心里有数

从我个人而言，在身份合法、手续齐全、行为得当的情况下，大多数时候在街上面对巡警的盘问时都能够全身而退，但另外一个警察群体——交警，就没有这么好对付了。因为相较于外貌来说，外国人在哈萨克斯坦有一个先天的“劣势”：外国人和外资公司名下车辆的车牌颜色为黄色，同本国公民的白色车牌相比极为显眼，这也间接导致了黄牌车辆在哈国频繁被拦。

2016年冬，我应朋友之托去阿斯塔纳机场接人。算好了路况和时间后，我顺着Kabanbai大街驶出市区，在城郊公路上正常行驶。路过一个路口后，后方突然响起了警笛声，一辆警车跟了上来并示意我靠边停车。从车上钻出一个“圆滚滚”的警察。之所以说是“圆滚滚”，一是因为他体态确实很壮，二是因为当时的阿斯塔纳正值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他不知套了多少层棉坎肩，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他踩着路肩上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示意我摇下窗户，慵懒地敬了个礼让我出示证件，并表示“您超速了”。

哈萨克斯坦城市内限速为60公里/小时，作为“老司机”的我一直的习惯都是卡着最高限速开车。彼时的哈萨克斯坦城市内是有测速装置的，但是数量很少。交警查超速大多是在车内架设一台机器，一般由一人盯着机器，一人负责拦车。我回头看了一眼停在后边的警车，车内并没有其他警察，心里就明白了个大概。争辩了几句后，我拿不出自己没超速的证据，而他也不展示我超速的证据，但是坚持要对我进行三万坚戈（约合人民币六百元）的罚款。“经验丰富”的我表示能不能进车里谈一谈，警察向我比划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说道：“按照规定我不能进你的车里”，然后指了指自己警服外背带上的一个很小的录像装置。我瞬间明白，表示理解。“我再去查看一下机器数值，确定一下你刚才的时速。”他转身走向警车，开门进去，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把最外边的一层警服换掉了。

他打开后门钻进车的后座，警惕地看了一圈：“行车记录仪，没有吧？”

我表示没有：“您也看到了，我就是个学生，不是商人，是帮朋友去机场接人的，时间快来不及了。”

“那我们这样吧，”他用手指比了一个“2”，“我也不耽误你去接人。”

“达瓦里氏，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即使超速也就是五千至一万坚戈的罚款，更何况我认为我并没有超速。”

“那你想怎么样？”

我低头看了看时间，如果继续耽误下去可能会误了时间：“三千，给您和同事们去喝茶。”意思是自己知道这些钱是不用上缴的，纯属他的额外收入。

“会有人查看刚才的录像的，到时候我也要有交代。”他又用手势比了一个“1”。这个时候他完全显现出了一个商人的气势，没有一点警察的样子。

在一翻讨价还价后，最后以七千坚戈成交。下车后，他拽了拽身上的警服，立马恢复了警察的模样：“你确定刚才没有任何录像录音吧？”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向我敬了个礼：“请注意行驶安全。”然后转身离去。

在哈萨克斯坦期间，我同另一名在哈访学的学者朋友进行了两次环哈调研，分为北线和南线两次进行。在进行北线调研的时候选取了一个哈国人经营的租车公司，车牌照为白色，但在结束行程返还车辆后，被以各种理由刁难要求进行补款赔偿。因此在进行南线调研的时候，选取了一个美国合资的知名租车公司，但美中不足的就是车牌照颜色为黄色。



图2 两次租赁的车辆，牌照分别为白色和黄色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两次行程相比较，南线过程中被警察拦下的次数要远高于北线行程。在2015-2017年，哈国各地之间高速公路数量极少，大多数都是类似国道的双向两车道公路。高速公路过路费的替代品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交警们大多在公路拐角处或者南方山路的角落中对过路的车辆进行拦截，所有司机都对此深恶痛绝，也衍生出了一种暖心的道路文化：如果在公路上看到对面驶来的车辆向你闪三下远光灯，就要马上减速平稳行驶，因为这是对方在告诉你，“在你那一侧前方有警察在查车，小心些”。接收到信息的车辆也会同样闪灯表示感谢。这种互相提醒的办法能够有效地减少被拦下的概率，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得靠运气，因为是否是“平稳驾驶”警察也是有发言权的。

被拦的多了，心里就有数了：远远看到警察手持警棍向我们晃动，我就会让朋友准备五千坚戈的零钱放在我兜里。与在城里时司机不准下车的规矩不一样，在国道上被拦下后司机需要自己拿着各类证件和文件前往警车边上给他们检

查。而进入警车内“展示违章证据”的过程基本上也就是交易的过程。

“违章证据”基本就是一个屏幕上回放的车辆录像和通过速度，没有限速提示，没有超速警告，就是口头告诉你“你超速了”——你的通行速度永远超过他们口中的限制时速。准备零钱的意义在于，如果你在掏钱的过程中露出了“大票”，那之前费劲谈好的价格就依然存在着改变的可能。交警们也对两个开车进入各种“偏远地区”的外国学者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友好”地进行茶水费金额商议后，往往也会跟问两个和中国相关的问题、开上两个不痛不痒的玩笑。随着自己的砍价技能渐入佳境，茶水费也慢慢从最开始的一万坚戈变为了五千、三千甚至两千。这样下来，每趟约两千多公里的行程花在“茶水费”上的价格也可以控制在七八百元人民币左右，为了心理平衡，姑且就当是给高速公路交的过路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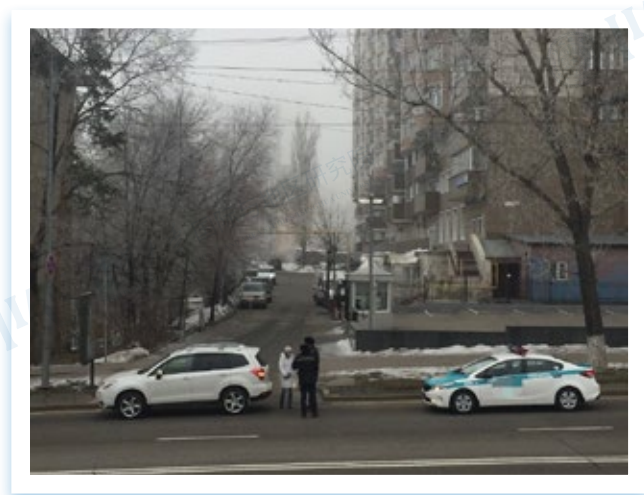


图3 交警在路上拦车盘问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三、无可奈何

对于警察的各种贬损充斥着整个俄语网络世界。在 2011 年有俄罗斯媒体在街头进行采访“你更害怕警察还是流氓？”，得到的回答大约是各占一半。而在评论区中则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警察。在哈萨克斯坦，当地出租车司机将交警称呼为“狗”。“xxxx（脏话），前边有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表示不解，司机说：“因为他们干的也不是人事儿。”

初到哈萨克斯坦时，我认识了楼下一位名叫阿依达的当地阿姨，那时他的小儿子阿里刚刚入伍在总统府作卫兵。有一次他休假回家和朋友聚会时叫我一起参加，里边刚好有一个警察朋友。二两酒下肚后大家互相开起了玩笑，我也就随着一起发了发牢骚。

“科里亚，不瞒你说，你说的那些事儿我也干，”
他举起酒杯：“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跟他碰杯，他一饮而尽：“我 24 岁了，做了快三年警察了，你猜我每个月工资多少钱？不到七万坚戈（当时约合一千四百人民币）！你要知道，阿斯塔纳现在已经没有低于二十万（指每平方米价格，约合四千元人民币）的房子了！”

我转头看了看阿里，他低着头撕着手里的馕，脸上也带着苦笑。我知道阿里一家四口就挤在我租住地方楼下的一套不到 40 平米的一居室里。

“我得干 15 年才能买一间 40 平米的公寓！我还没有女朋友呢，那以后结婚，孩子怎么养呢？”

一桌人没有说话，警察朋友顿了顿接着说道：“国家给我们的钱太少了，所以我们的一些做法真的是为了生活，并不是贪得无厌。”

除了自己的生计压力外，他还在后边的聊天中向我诉说了工作中面临的其他种种。由于社会的普遍不信任、百姓的偏见和怨恨，他甚至在便装生活中不敢透露自己的警察身份。

这个朋友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我产生了影响。挨罚是挨罚，砍价是砍价。以后再遇到警察收茶水费，哪怕明知是为当地政府工资发放不足买单，只要想到他的这一席感叹，却也说服自己算了。

回想自己的整个国外生活，关于警察的记忆真的全部都是负面的吗？某年冬天的俄罗斯，下午四点多天就已经开始暗下来。从地铁终点站出来后身后大概十米的位置一直有个穿着皮衣的光头青年跟着我，那可能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光头党”。我正在犹豫跑不跑、按什么路线跑，突然响起一声警笛，警灯红蓝相间的颜色照在了我前边的雪地上。一辆警车缓缓地从我后方跟了上来，而我再回头看的时候，一直跟着我的人早已没影了。警车就随着我的步速慢慢地跟着，没有任何动作也没人说话，一直跟到看着我进小区，这才加速驶离。而当时年纪不到 20 岁的我羽绒服里早已湿透。

一个在阿拉木图读博士的女性朋友也向我讲述了相似的经历：疫情暴发前的某天晚上，她从运动馆运动完回家，天已经很晚了，路上也没有人。突然对面来了三四个小混混模样的人，径直着朝她走来。就在她不知所措时，一辆警车慢慢开到她身后并且亮起了警灯，“一瞬间就不怕了！”她说。

警察在全世界都属于绝对的高危职业，在独联体国家更是如此，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几乎整个社会的敌意。据统计，2020年2月至4月，仅在阿拉木图市就发生了35起袭警事件；而自哈萨克斯坦独立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797名警察在执行任务中丧生，2604名警察受重伤。在了解了上述数据后，再想想在室外拦住我查护照的巡警、海关查我手机删照片的警察、路上收“过路费”的交警，所有这些场景中的各种愤怒、不服甚至好笑，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再看又显得可以被理解了。纵使他们前边刚拿了人们给的“茶水钱”，但当危险真正出现时，警察却也是我们在外游子唯一能够信任和依靠的群体。

四、结语

2020年10月29日的哈萨克斯坦内务部扩大会议上，总统托卡耶夫提议进一步为警察群体提高工资并追加住房补贴。与此同时，自2018年开始，全国开始精简警察队伍，至今已经减少了近20%的警察人数。

和那个一起喝酒的警察朋友已经失联多年，今年他应该也快30岁了。不知道他涨没涨工资，结没结婚，买没买房，生没生孩子，是不是还在街头为了生活“奋斗”。我有点想跟他再聊一聊。

责任编辑：李音 文字审校：董慧

“再造”的古巴美食和古巴厨房里的“美食家”（上）

唐永艳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古巴

2019年12月23日，好友 Andres 给我打来座机电话，他激动地说道：“Benita，你知道吗？你出名了，连我的房东都知道有个叫 Benita 的中国女孩竟然用橙子炒黑豆（frijoles con naranja），用辣椒拌西瓜（melón con picante），她太震惊了，想知道你是怎么做的，要你的配方！”

我哭笑不得，这已经是第3个古巴老太太想跟我“探讨厨艺”了。在互联网没有完全普及且价格高昂的古巴，固定电话低廉的费用以及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视，使“电话粥”成为古巴人沟通感情的主要方式之一，而这种依仗人际关系为桥梁进行的信息沟通经常是一根鸡毛传成一只鸡的故事发生背景。房东大概把我在厨房里“出格”的故事告诉给了她所有的好友，他们口耳相传，我便这样活跃在哈瓦那房东老太太们的电话朋友圈中。

短暂的受宠若惊后，我莫名生出感慨：每一个社会的饮食文化都是社会群体历来对其消费的食物进行分类、选择和整合的历史积淀，但凡遭遇超出群体认知外的东西，便足以造成文化震惊。我对古巴的探索是这样的过程，他们对我的认识也是。略微小庆幸的是，我这段因“生存需求”发掘出“出

色”厨艺的经历，竟成为了我从饮食方面更深一步了解古巴社会的契机。

一、“传统的发明”

稍微了解古巴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国家有着几样出名的美食：黑豆饭（congrí），炸香蕉（plátano frito），以各种根茎食物为主做的炖菜（ajiaco）。然而，正如霍布斯鲍姆在其《传统的发明》中探讨的主题所言，人们所热衷的某些“传统”，有时往往只是在理所当然的想象中赋予了它悠久的历史感。跟4个不同的古巴家庭合住后我才发现，这些古巴人喜爱的“国菜”竟也经历了一个“传统发明”的过程，距离当下不过近三十年时间。其得以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90年代后古巴自然条件的限制，国内有限食材只能做出这些食物；二是古巴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试图塑造的“低物质欲望社会”至今仍有残影，国人对于国内有限的食材普遍评价很高。



图1 传统的古巴黑豆饭，由黑豆米饭，炸香蕉，蔬菜沙拉，肉类，根茎类食物等组成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古巴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群岛国家，介于北纬 20°至北纬 23.5°间，地处热带地区，气温常年约在 25 到 32 摄氏度之间。受到来自大西洋东北信风的影响，年降水量丰富，岛上多数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少部分为热带草原气候，全年湿度约为 90%，一年仅在 12 月到 1 月份间会有短暂的降温，时常会有季节性飓风、干旱和虫灾等自然灾害侵袭。本地生产热带作物和水果，如甘蔗、烟草、芒果、牛油果、木薯、红薯、山药、芋头等。

在 90 年代苏联解体前，古巴农业模式先后经历了殖民经济、美国资本渗透以及古巴社会主义改革三个时期。然而，尽管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但整体上古巴农业仍没有走出殖民时期的生产模式，近百年间古巴主要以种植甘蔗和烟草为出口作物，进口主要食物供养全岛人民。其中，苏联时期为生产单一作物的分配计划使古巴农业遭受了不可逆的破坏，至今为止，全岛居民的基本饮食无法实现自给自足。

1972 年，古巴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onsejo de Ayuda Mutua Económica，简称 CAME），正式参与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División Internacional Socialista del Trabajo）。为了满足全球社会主义经济战略的贸易需求，该岛 50% 的可耕地用于种植糖、烟草和柑橘三种产品。这些产品以优惠价格出口到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换取石油、农业机械、农用化学品和基本食物。尽管彼时该岛仍还有很大的生产潜力，但基于联盟一体化需求，除了种植出口商品外，岛上大量土地被闲置。此后 25 年间，古巴出口所创造的收入主要用于进口人民所需的 57% 的基本食品以及 95% 的农业投入。

199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联盟解体，古巴热带出口产品的主要市场也随之消失。美国实施的经济封锁使古巴政府无法同其他国家进行进口和贸易，从而加深了古巴的粮食危机。面对国内粮食短缺，古巴政府迅速采取政策，鼓励分散和多样化的粮食生产，促进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自给自足。然而，经过几十年化肥和农药的密集使用，从高外部投入的工业化农业转向低内部投入的无机农业并非易事。据统计，先前高度机械化农业模式和高强度的农用化学品使用，使古巴农村人口从56%降到28%；1991年后，依赖进口的化肥和农药在古巴突然消失，农业虫灾显著增加，农业用地退化达到76.8%。

由于之前古巴人饮食中的大米、豆类、小麦和肉类等主食基本靠进口，依仗国内资源满足本国人民的粮食供给需求是突然且紧急的。此时，包括芋头、山药、木薯、香蕉、南瓜和土豆在内的根茎类食物作为最适应岛上环境且一年四季都能生产的食物开始得到政府重视，并逐渐成为岛上唯一能自给自足的食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根茎类食物开始作为替代性主食进入到古巴人的食物清单中，重构了古巴人的饮食结构并奠定了当下的饮食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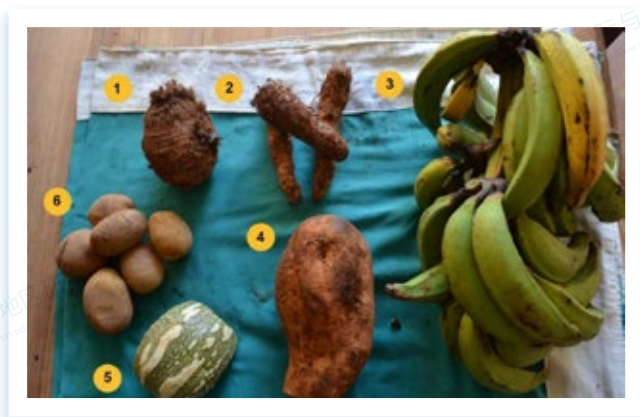


图2 按照数字升序分别为木薯、山药、香蕉、红薯、南瓜、土豆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根茎食物作为古巴饮食结构中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5个世纪以前。木薯和红薯等块茎作物本是当时原住民的主要食品，在西班牙人屠杀完该岛土著居民后，这些食物成为西班牙人的补充食物。随后全球殖民贸易将大量的非洲黑人奴隶、加那利群岛的移民以及华人“契约劳动”汇聚到了这里，他们带来猪肉、牛肉、香蕉、大米、豆类、小麦和马铃薯等饮食及相应的饮食文化习惯，丰富了该岛的饮食结构，构成了古巴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几个世纪，由于岛上土地主要用于种植烟草和甘蔗等作物，主食主要依赖进口，作为原住民主食的根茎类食物虽一直存在，但通常仅作为补充食物和少部分人的主食，处于边缘位置。

仅以当下古巴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香蕉为例，据文献记载，将香蕉纳入古巴饮食结构可以追溯到16世纪非洲奴隶的到来时期。从殖民时期起，香蕉基本上是黑人奴隶和一些贫穷白人的食物，这种状况虽在1959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后强调“种族一体化”和“国家分配”等政策下有所改变，但直到90年代苏联解体后因国内食物的匮乏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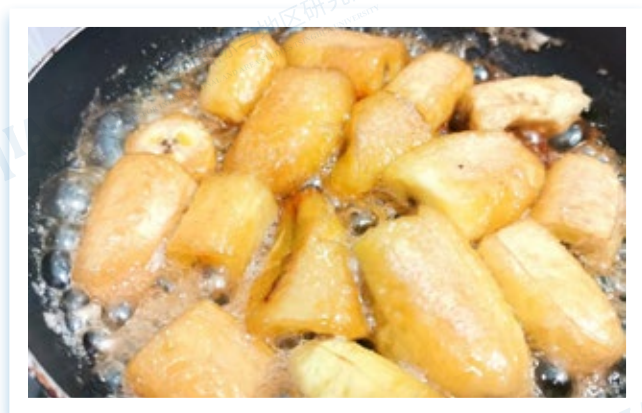


图3 房东教我做古巴当下流行的食物：香蕉的诱惑 (plátano en Tentación)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古巴本土主要生产穆萨帕拉蒂亚 (*Musa paratia*) 和穆萨纳纳 (*Musa nana*) 两种香蕉，1991 年后，由于缺乏农药和化肥以及土地退化等因素，一种叶斑病 (*la sigatoka amarilla*) 使之濒临灭绝。为了寻找能够适应古巴本土环境的替代品，古巴向洪都拉斯农业研究基金会 (*la Fundación Hondureña de Investigaciones Agrícolas*) 引入了多种新的香蕉品种，最终在对比实验中选择了最为适应古巴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品种 *Musa sp. abb*。虽然它的口味不如之前的香蕉充满甜味，但由于缺乏选择，这种食物逐渐在古巴厨房内获得空间，古巴人的饮食习惯也随之改变。目前 *Musa sp. abb* 已经在古巴有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驴香蕉 (*plátano burro*)，它经常被用来制作传统菜肴，如富富 (*fufú*)¹ 或者黑豆饭 (*congrí*)。当下很多古巴人都十分喜欢这一食材，因为这种香蕉的烹饪速度更快，在古巴炎热的气候中储存期相对较长，全年都可以收获。



图 4 2020 年疫情期间，香蕉是古巴菜市场唯一能够相对稳定供应的食物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1 富富是古巴传统的一道美食，缘起于非洲加纳，后来在殖民贸易中由非洲奴隶传到加勒比地区，古巴的富富主要是将香蕉与油锅中少量的葱花大蒜等放在一起均匀捣碎，辅与其他调料，是古巴人十分喜爱的食物之一。

二、低欲望社会烙印

除了受客观条件影响，这些曾经边缘化的根茎类食材成为古巴主流食物也离不开国家的提倡和引导。1959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第二年便成立了古巴国内需求研究和指导研究所（The Cuban Institute of Research and Direction of Internal Demand, 简称 ICIODI）。ICIODI 的目标是向民众传播将消费最小化的思想，引导人们脱离对于物质的欲望，追求内在精神和实质的东西，以此建立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个人和商品间的关系。从建立至今，这一机构从教育和宣传等诸多方面，通过各种策略引导着人们购买国内相对廉价、营养丰富、可大量获得的食品。比如在苏联解体前，为了引导人们购买国内相对充足且价格便宜的食物，ICIODI 将使用国产商品描绘成反抗古巴资本主义敌人的重要行为。据古巴作家丽贝卡·蒙特罗（Rebeca Montero）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的哈瓦那大街上，一个广告牌自豪地宣称“口香糖，不；芋头，是”（Malanga sí, chicle no）的口号——鼓励古巴人咀嚼当地种植的芋头，而不是口香糖，因为口香糖是一种进口产品，也是美国渗透的象征。

90年代后根茎食物广泛进入古巴人的主食领域也经历了该组织的引导。在古巴人的饮食观念中普遍认为“没有米饭和豆子，就没有食物”，而在苏联解体的几年间，岛上极度匮乏大米、豆类和肉类，只有不同品种的芋头、红薯、土豆、山药、木薯、南瓜和香蕉等根茎食物能够自给自足。为了保障社会安定和人们饮食结构的平稳过渡，ICIODI 的作用便是通过宣传让人们尽快地接受这些食物。不少古巴人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电视里经常向人们播报着“根茎类食物能改变

食物味道，使它更美味，更能填满你肚子”的宣传。有限的条件加上古巴人对于美食的感知，一道古巴当下流行的传统美食炖菜（ajiacó）便形成了。

炖菜（ajiacó）是古巴传统革命食物热锅（la caldosa）的变体，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巴革命胜利时期。自1960年来，每年9月28日被定为是纪念保卫革命委员会（CDR）的成立日，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在古巴社区中人们会集体准备一道由鸡肉、各种食物和番茄汁做成的“热锅”，伴随着朗姆酒一起分享。该庆祝方式后来逐渐传遍了全国，甚至被用于其他类型庆祝活动的菜肴。90年代后由于岛上肉类的减少，ICIODI鼓励人们将根茎食物加入到这道菜中，这道曾经带着革命色彩的菜肴逐渐衍生出了热锅的很多变体，其中“炖菜”已经成为古巴当下流行的美食。



图5 古巴朋友给我准备的炖菜，包含山药、芋头、木薯、南瓜、玉米和鸡肉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此外，ICIODI还通过电视和广播等向民众普及这些根茎类食物的系统使用和准备方式，宣传着这些食物的某些医

学特性，甚至包含的革命意识形态等。至今为止，稍微年长的古巴人仍熟记着一些在特殊时期时宣传的内容：如果家中有婴儿，那么就要买甜甜的红薯，因为其含有糖类会让孩子变得愉快；如果有消化问题，芋头可以作为婴儿的第一食物和治疗胃病的药物，而且芋头有助于缓解更年期失调的作用；山药有抗抑郁和抗衰老的作用，并且能够缓解糖尿病和提高记忆力，但便秘时不要吃它；香蕉中大量的钾可以用来缓减关节问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6 对控制血糖有很好的作用；马梅²（Mamey）的种子熬水可以用来通便，马梅树的汁液与蜂蜜混合治疗支气管哮喘……对于国内牛肉的匮乏，我的古巴朋友跟我说到他曾经被教育过的内容：“牛肉是红肉，对心脏不好，还会造成糖尿病和肠道疾病；鸡肉是白肉且便宜，它可以跟许多古巴食材做在一起，特别美味，我最喜欢的是鸡肉。”

社会转型过程中“饮食结构”的重塑及国家对于低欲望社会的构建，这便是我来到古巴前的社会概貌。未能跨越殖民主义时期形塑的“依附型”经济模式使得古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陷于全球政治经济网络中，人们的饮食习惯变化与宏观的国际政治博弈有着极大的张力。与此同时，在苏联解体后，得益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构建的国家意识形态仍被绝大多数古巴人接受，政府对于本土食物的供给和引导使得古巴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较为平稳地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最终奠定了当下的饮食结构。古巴再造的“国食”无疑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生成物，不同的食材在古巴的特殊场域

2 马梅是一种原产于中美洲的物种，在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佛罗里达州都有种植，外表粗糙，黄褐色，内部呈橘红色，果肉甜软，含有大量维生素。

内也具有了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透过古巴人的饮食文化发展，一些当地人的社会文化观得以展现。

责任编辑：熊星翰 文字审校：董慧

来自东南亚的海南鸡饭： 美食中的族群互动、再生产与全球化 （上）

傅聪聪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国家和地区为马来西亚和东南亚

2020年12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宣布将新加坡“小贩文化”（Hawker Culture）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此事再度引发了邻国马来西亚网民的不满，质疑新加坡并无原创小贩美食、没资格申遗，甚至调侃新加坡将该国特色“Kiasu”（怕输）精神国际化。实际上，此次申遗争议的焦点集中于海南鸡饭、肉骨茶、黄姜饭、炒粿条、阿参叻沙、云吞面等小贩美食的“身份”归属。对此，大马名厨旺师傅认为美食无国界，归属权争不来，批评新国此举“傲慢”和“缺乏自信”。其实围绕美食身份归属之争，早在2019年新加坡决定为国菜之一的“海南鸡饭”申遗时，便引起邻国一片哗然；中国网媒更以“海南鸡饭竟不归海南？新加坡申遗，大马抗议”为题博取了一波国内网民的眼球。

来自东南亚的华人美食“海南鸡饭”——其“版权之争”背后反映了身份、文化再生产与地方性创新等问题，也牵涉到华人饮食的全球化。当前，很多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非常热衷于选择“饮食文化”作为毕业论文主题，然而其研

研究发现常常是对烹饪传统的个性化叙述，尤其是对食材、工艺、方法及其影响的介绍，缺乏学科视角与实地调研，也没有更深入对“人与文化之谜”进行探究。当前关于“鸡饭”或东南亚饮食的研究多从起源、形成过程、传播、影响等方面观察，而笔者拟探讨新马两国“海南鸡饭”的再造与创新问题，并以族群身份、再生产、地方性创新与全球化作为观察和解读新马华人及其烹饪传统的镜头。



图1 新加坡红山市场小贩中心“荣记传统海南鸡饭”

图片来源：早报网

“鸡饭寻踪”：海南岛没有海南鸡饭

正像中国有“八大菜系”，新马华人饮食按照烹饪传统的来源地域也可划分为“六大菜系”，包括闽南菜、福州菜、潮州菜、广东菜、客家菜和海南菜。其中，新马海南传统四大名菜之首便是海南鸡饭（其他三大名菜为加积鸭、东山羊和乐蟹）。海南鸡饭的特色是鸡肉配香饭，鸡肉口感滑嫩爽口，

米饭油润，吃进嘴里满口都是鸡油香。作为海南人必备年夜饭菜肴之一，过年吃的海南鸡饭，还要特别将油饭搓成鸡饭粒（鸡饭团），象征团团圆圆。而过年吃鸡亦有寓意吉利之说。

海南鸡饭又名文昌白斩鸡饭，因源自海南省文昌而得名。文昌一带素有“无鸡不成席”之说，鸡饭从海南本土向外传播也早已是东南亚华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众所周知，早期新马华人方言集团与行业垄断存在密切关系。¹人类学家陈志明指出，来自海南的许多移民在大马从事厨师工作，他们为富裕人家做菜，同时也会制作食品出售。当时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很多咖啡馆都是海南人开的。正是这样一小群海南籍厨师在文昌白斩鸡饭的再生产和地方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而言，海南鸡饭百食不厌，就像广州人爱吃云吞面，潮汕人爱吃牛肉粿条一样。这样一道使用中国烹饪常用食材制作而成的中式简餐，其做法（食谱）却由于家传手艺的不同而百花齐放、各不相同。由于传统食物原料的缺失，或是族群口味的改变，饮食的传承或再生产出现地方化和创新——使用当地的原料或者新的烹饪知识。东马诗巫海南会馆第一副主席严世茗的夫人何宜娥的手艺传自家婆。她指出，正宗的海南鸡饭是以文昌鸡烹调，然而本地无处寻得文昌鸡，唯有就地取材，以“肉鸡”或“半菜鸡”烹调，风味已经本地化，仍以传统的白斩制法来料理。她认为海南鸡饭

¹ 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也许是对这一现象的第一位观察者，他将华人划分为买卖人和商人、工匠和工人，还有农夫。但是他未提及海南人的职业，大概是因为他觉得不太重要。1848年，著名潮籍商人、华社领袖余有进指出，新加坡的海南人是最小的团体，仅有700人，所有人都是从农村雇来的店员或伙计。

最独特的是一鸡三味，烹煮鸡肉的鸡汤，也用来煮鸡饭，也用于调制佐料。同时，其夫家家传的作料按照传统方式调制，将蒜末、姜末、辣椒末、酸柑汁、酸柑皮混合在一起，加入适量鸡汤及少许盐调味，搅拌均匀即可（佐料的辣度及酸度可以依据个人口味喜好来调配），更为鸡饭增色。

材料：鸡一只、姜1块、青葱2棵、蒜头1颗、鸡油1片、葱酥适量、香叶适量、麻油适量、香米。

白斩鸡做法：

1. 鸡只洗净，将蒜头粒、2棵青葱、姜1块，一同塞进鸡肚内，在鸡身外抹盐腌制一下。
2. 煮滚一锅水，将鸡身外的盐洗净之后放入滚水中，再以小火翻煮鸡只约8分钟，之后盖上锅盖，让水滚约3分钟之后，熄火浸约20分钟至鸡肉熟。将熟的鸡只捞起，在鸡身抹上麻油即可。剩余的鸡汤备用，用于煮鸡饭及调制佐料。

鸡饭做法：

1. 将鸡油下锅以小火煸出油，之后将鸡油渣取出，加入剁碎的蒜末炒香，再加入洗净的米，以小火翻炒米至带点黏性即可，令米饭吃起来比较Q弹。
2. 炒好的米加入鸡汤（鸡汤量依据米量而定）、香叶及葱酥煮至米半熟，再加入麻油煮熟为止（间中可以试下米饭咸度，若咸味不足可以加入少许盐调味）。

表1 何宜娥的海南鸡饭食谱

数据来源：“七乡团年菜味儿·海南鸡饭”，马来西亚星洲网

饮食的再生产和地方化创新是对菜肴原有形式与内容的一次成功的再创造。马来西亚华人族群与文化专家安焕然教授于2017年赴琼开会期间，曾随同时任南方大学学院校长祝家华一起回到文昌老家并品尝当地鸡饭。他记述到，文昌鸡油而不腻、咬劲“十足”。当地人笑道，“新马所谓的海南鸡饭的鸡，肉质太软了，没有什么口感。而文昌的鸡是放养的。”

但更重要的是，他还同时指出，文昌鸡饭中的“饭”其实普普通通，还是身在大马的母亲煮的比较好吃。“大马的海南鸡饭，姜多蒜多，有的还加班兰叶、牛油，讲真的，比海南老乡的还要香。”安焕然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海南岛并没有他行前想追溯的“海南鸡饭”，而只有“文昌鸡饭”，其实真正的海南鸡饭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而非海南得到了最好的呈现，成为东南亚华人对中国传统饮食的重大贡献。



图2 马来西亚华人制作的油饭

图片来源：阿将正宗海南鸡饭，脸书（Facebook）

既然海南岛没有“海南鸡饭”，那这一美食究竟根在哪里？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版权归属”激辩，就显得异常微妙。现代民族国家的分化使得新马两国的一些华人将其共同的饮食传统分别视为新加坡人或是马来西亚人的。为了发展旅游业，新加坡十分积极宣传小贩美食，称这些菜肴理所应当属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政客、社团领袖则试图捍卫马来西亚海南鸡饭的正统；海南会馆联合会甚至提出颁发海南鸡饭合格证，以确保相关销售点上所售卖的海南鸡饭

都是正宗的。饮食与身份认同相关，并被应用于政治认同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自不同的华人族群，都努力通过这一饮食传统将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他们所要表达和强调的就是自身地方化的身份认同。

族群互动与地方化

美国人类学家尤金·N·安德森 (E. N. Anderson) 注意到，华人比其他移民群体能够更长久、更忠实地维系他们的日常饮食习惯。这种现象在东南亚地区尤其如此。² 陈志明指出，受到族群间互动、地方化以及全球交流的影响，文化在饮食（文化）上发生了改变，而东南亚各地形成各自的华人饮食传统也构成一种文化传统。欲理解这一文化传统，就需要深入观察和了解各国、各地的华人饮食文化，同时对相似的饮食开展比较研究，由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关各类饮食传统变迁的延续性、文化象征以及地方化创新等大量的信息。陈志明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文化动力。

在全球范围内，从中国不同的地区发展并形成的一个核心的饮食传统，通过华人群体的再生产，逐渐形成了新的饮食文化传统。“海南鸡饭”就是海南饮食传统在东南亚尤其是新马再生产的成功典范。对于东南亚华人饮食的再生产，陈志明指出，再生产是本土化创新，或者从当地人那里采纳的食物添加行为。海南鸡饭在再生产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

2 东南亚也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点，因此这一地区的华人已经形成了他们独具特色的中国菜（华人餐）——这些菜肴或许可以被描述为马来西亚中国菜、新加坡中国菜、菲律宾中国菜、印尼中国菜等。

形式，又反映了怎样的身份认同、地方化创新呢？对此，我在当地观察到三个不同的例子。

海南鸡饭的地方化

海南鸡饭在大马、新加坡和泰国南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价廉味美的饮食，深获普罗大众喜爱，鸡饭食档大街小巷俯拾皆是。

早年间的鸡饭档是由地道的海南人经营，琼籍华侨华人浓厚的乡土情怀推动他们继续守护海南味道的“正宗性”。位于巴生港班达马兰、有着 65 年历史的侂园茶室是一家正宗的海南风味餐馆，老板娘符玉娇出生于海南岛，其家庭背景和餐饮关系密切，父亲在马来西亚做厨师，母亲的娘家在海南岛开餐馆。侂园茶室由符玉娇父亲创建。她从小就学习厨艺并在店里帮工，后来更接手茶室经营，目前茶室已经传到第三代，由符玉娇的儿子接管。在这里，人们可以品尝到口味正宗的白斩鸡和鸡饭粒。现年 78 岁的海南师傅陆建守煮鸡饭有数十年功力，他制作的海南鸡饭是一种古早味的版本，制作过程比市面上的鸡饭要复杂，但口味更香浓。符玉娇和陆建守都坚持传统烹饪方法，食材选择上也尽量选择传统的菜园鸡以确保肉质香甜而有弹性。

但是，海南鸡饭的食材选择、烹煮方式也不断经历着地方化创新。符玉娇透露，她家的饭采用彭亨州的文冬姜以及上等香米，米饭中还加入葱头和蒜头，确保饭香十足而不油腻。除侂园茶室外，森美兰州沉香四块八小食中心经营 20

年之久的洪记海南鸡饭更是将叉烧、烧肉和鸡饭搭配，除了白斩鸡饭还有烧鸡饭。“饭香鸡滑”是广大主顾对洪记的评价，食客往往餐后再来一杯咖啡，饱足感满满。



图3 芙蓉最受欢迎的鸡饭档之一“洪记海南鸡饭”，老板周进福正在制作鸡饭
图片来源：星州网

随着在海外广受欢迎，海南鸡饭已经成为一种饮食品牌。如今，许多并非海南籍贯的华人经营的鸡饭档也是宾朋满座。张志鹏（44岁）来自南马柔佛州的亚依淡（Ayer Hitam），2011年随妻子黄秋霞来到北马的双溪大年（Sungai Patani），

成为吉打“媳妇”并拜师学“鸡”。2015年，他的好友周婷娜的妈妈宋祝荣想结束自己海南鸡饭的生意，但又不忍心让厨艺失传，于是决定传授给张志鹏。学厨过程中，宋祝荣交代鸡饭的重点是饭一定要香，鸡和材料一定要新鲜，才能煮出一道美味的海南鸡饭；炸鸡时一定要控制温度，才能确保鸡有肉质而又滑嫩。直到张志鹏煮出宋祝荣独创的鸡饭味道后，宋才放手允其做鸡饭生意。



图4 鸡饭档老板张志鹏

图片来源：阿将正宗海南鸡饭，脸书（Facebook）

学有所成后，因为志鹏姓氏为“张”，身份证上拼作“Chiang”，久而久之朋友把他的名字读成了“蒋”，最后干脆以“蒋哥”为鸡饭命名，开启了“蒋哥正宗海南鸡饭”的生涯。随后在老饕食客的妙手提点之下，通过准备青葱酱和改变辣椒制作方法，“蒋哥”鸡饭的口味再次得到提升。张

志鹏说，“我不是海南人，是广西人，不过我相信，我也有本事做出好吃的正宗海南鸡饭。我想让海南人吃了我的鸡饭，都会竖起拇指称赞。”目前，张志鹏的档口位于斑鸠湾城镇新聚丰咖啡店内，小份鸡饭 3.3 马币（约合人民币 5.6 元），大份 4 马币（约合人民币 6.8 元），可谓物美价廉。除了售卖鸡饭，他的档内还有鸡腿、尾肉、鸡心、鸡肝、卤蛋、卤豆干等小食。

无论籍贯是否正统，新马华人在追求“海南味道”或者说坚持传统上都非常执着，然而同时在烹饪的方法、食材使用、餐食的搭配上，都不断推陈出新，迎合时代的变迁与本地口味的偏好。

责任编辑：熊星翰 文字审校：王琴



IIAS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海淀区清华园1号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205室

中国 北京 100084

+86-10-62787747

<http://ias.tsinghua.edu.cn/>

主 编 张 静

责 编 组 高良敏

文 字 编 辑 董 慧

李宇晴

王 琴

熊星翰

许 帅

李 音

郑 楠